

海軍武嚇、上海中立化與合作政策： 江浙戰爭期間列強對華舉措分析*

應俊豪**

1924年的江浙戰爭為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前哨戰，因戰場位置毗鄰上海租界，故引起列強極大關注。為了避免戰事波及上海，列強基本上採取兩種手段來限制戰事發展：一是執行海軍武嚇行動，另一則是推動上海中立化。海軍武嚇行動與區域中立化方案，是近代以來列強因應中國亂局時慣常使用模式。本文擬透過江浙戰爭期間列強採取的海軍武嚇行動以及上海中立化問題，來分析華盛頓會議後列強對華合作政策決策的實際運作情況。

首先，由江浙戰爭期間列強海軍武嚇行動的運作情況與決策經過，可以發現看似強勢的砲艦外交，受到華會體系影響與美國的主導下，其實隱含著避免使用武力介入中國內政事務的大前提。此類「海軍在場」的溫和型砲艦外交模式，乃不戰而屈人之兵，透過列強海軍合作，以武力為恫嚇手段，確保外人在華利益。

* 本文為筆者國科會計畫：「內戰威脅與長江中下游航行安全問題：1920年代上半期列強『砲艦外交』的再思考」(NSC 98-2410-H-019-004-MY2)部份研究成果。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細心審閱，並多次提供修改建議與調整方向，特致謝忱。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聯絡地址：基隆市20224中正區北寧路2號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Oceanic Culture, NTOU, 2 Pei-Ning Road, Keelung 20224, Taiwan (R.O.C))

其次，列強駐華使領與海軍當局所提的上海附近劃為中立區方案，雖然不合條約規定，但因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與交通特性，列強可以輕易集結海軍，並以強大武力為後盾，造成實質的中立化。

最後，從江浙戰爭期間美、英、日三國的態度，也可以清楚看到列強彼此之間各自的盤算。自華會以降，美國政府一再重申不介入中國內戰、尊重中國主權的立場，並試圖將美國對華政策，藉由列強協調合作的途徑，進一步擴大為各國共識。英、日兩國雖然表面上不願抵觸美國，凡事協調、嚴守中立，然而卻各有考量。英國嚴守中立，乃因樂見直系武力統一政策落實，有助英國在華利益進一步的擴大。至於日本，則只緊抓東北地區，對長江流域等非日本特殊利益的地區，自然也願與英美協調一致，以免猜忌。因此，由江浙戰爭列強對華舉措來看，華會體制所確立的合作政策，雖然在美國力挺以及英日顧慮美國態度下，尚能維持表面上的合作，然而如深入分析箇中利害關係，實際上仍是各唱各的調。

關鍵詞：江浙戰爭、砲艦外交、上海中立化、華盛頓會議體制、合作政策

一、前言

沒有一個歐美國家有興趣捲入中國永無止境的內戰之中。但是當內戰發生的地區，可能威脅到大量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時，列強有責任採取行動護衛其利益與權利。長久以來，列強的確在中國採取聯合行動。……對於關係上海安全至鉅的情況(江浙戰爭)，列強至少已經充分展現了這種聯合意志。這應該會發揮作用，我們相信上海應該不會受到地方戰爭的波及。

《泰晤士報》(*The Times*)1924年9月11日¹

美國學者林蔚(Arthur Waldron)稱1924-1925年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因為這段時期的內戰，刺激了中國社會，並改變中外關係，從而導致了五卅民族主義運動的出現。²但這一段時期的歷史卻甚少受到史學家關注。研究五卅運動者眾，但五卅以前形塑社會的內戰，卻少有人關心。³特別是近代中外關係史的角度來看，民國時期內戰的發生及其後續效應，除了造成中國社會本身的嚴重不安與百姓流離失所之外，更足以改變在華外人對於中國內政事態發展的觀感，從而影響列強政府對華的態度與決策。尤有要者，當列強改採砲艦外交的強硬路線，擴充駐華軍備，或是動用海軍武力來回應中國現狀時，稍有不慎即可能演變成重大華洋衝突案件，反轉回來刺激到中國社會日益敏感的主權與民族神經，屆時聲勢更為浩大的民族主義運動於焉產生。⁴因此，要研究民國時期的中外關係，除了

¹ “Rival War Lords in China,” *The Times*, 11 September 1924.

² Arthur Waldron,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³ 柯博文(Parks Coble)即有這樣的感想，見Parks Coble, “War and Chinese Society,”「中國近代的再思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6月29日-7月1日。

⁴ 筆者先前研究1920年代長江上游地區的內戰與航行安全問題，以及列強的因應之道，即清楚觀察到軍閥內戰及其附帶引起的社會問題(如土匪、仇外)，可能從本質上改變中外關係，刺激列強採取較為強硬的動武方針。可以參見應俊豪，《外交與

正規的官方層次外交外，也要試圖從內戰的角度，去理解外人對中國的觀感，以及列強對華政策，如何隨著內戰的發展而有所改變。

發生在 1924 年的江浙戰爭是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前哨戰，因戰場位置毗鄰上海，一旦戰事擴大，即可能波及租界，甚至影響到對海外海運交通，造成重大損失，故引起列強極大的關注，紛紛增兵上海。⁵為了避免戰事影響外人在華利益，戰爭期間列強基本上採取兩種手段來限制戰事發展，確保上海安全，一個是執行海軍武嚇行動，另一個則是推動上海中立化。海軍武嚇行動與區域中立化方案，均非江浙戰爭期間的創舉，而是近代以來列強因應中國亂局時慣常使用模式。這兩種模式各有其歷史發展的脈絡，在江浙戰爭中也牽涉到極為複雜的決策經過。本文擬針對江浙戰爭期間列強採取的海軍武嚇行動以及上海中立化問題，來分析列強決策背後彼此之間協調合作與勾心鬥角的情況。

首先，就國際環境來說，深深影響一戰後、1920 年代東亞秩序與列強整體對華態度，即「凡爾賽—華盛頓會議」體系或「華盛頓會議」體制(以下簡稱華會體系)。⁶〈九國公約〉第一條，亦即所謂的羅脫(Elihu Root)四原則，最能具體而微刻劃出華會體系基本精神，其大意为：尊重中國主權、獨立、行政與領土的完整；提供一個完整無礙的機會，讓中國發展一個強而有力穩定的政府；列強發揮其影響力以追求在華商務與產業機會均等；列強不利用中國現狀謀求特殊利益，或有損其他列強的利益或安全。⁷由上

砲艦的迷思：1920年代前期長江上游航行安全問題與列強的因應之道》(臺北：學生書局，2010)，總頁365。

⁵ 〈蘇浙開戰と海運〉，《大阪每日新聞》(大阪)，1924年9月5日。

⁶ 關於華盛頓會議體制的深入討論，可以參見唐啟華，〈一九二〇年代中國外交的重估(1919-1931)〉，收入《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2002)，頁33-59；唐啟華，〈北洋外交與「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收入金光耀、王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47-80；川島真，〈再論華盛頓會議體制〉，收入金光耀、王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頁81-90。

⁷ A Treaty between All Nine Powers Relating to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to Be Followed in Matters Concerning China, U. S. Naval War College, *International Law Documents: Conference on the Limitation of Armament with Notes and Index, 1921*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3), 342-351.

述原則，不難勾勒出華會體系基本精神，一是調整列強對華態度，嚴守中立，不干涉中國內政事務，也不利用中國現狀擴大特權；二是列強之間以合作代替競爭，彼此協調共享在華商務利益，這也是美國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擴大化。因此，本文擬從江浙戰爭期間列強海軍的武嚇行動，檢視華會體系的兩個主要原則——列強合作政策、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實際運作情況。尤其列強彼此之間對於江浙戰爭的不同考量，勢將影響合作政策的成效；而列強對於海軍武嚇行動的尺度，則關係到海軍武力介入與砲艦外交的運作模式，是否可能違背中立、干涉中國內政，從而抵觸華會體系原則。

其次，從列強推動中立化方案的歷史檢視，晚清以來，每當發生內戰、兵變而威脅到通商口岸、租界時，列強往往企圖藉口宣告口岸、租界周圍地區的中立化，來確保當地外人生命、財產的安全。例如晚清太平天國之亂期間，1853年因為小刀會在上海起事，英法駐上海領事為確保租界安全，即曾宣布上海保持中立，甚至不准清朝官員在租界內的江海關內辦公。⁸民國以後，1913年二次革命期間，上海領事團曾宣布上海周圍15哩地區為中立區域，禁止進行任何的戰鬥行為。⁹1920-21年因為湖北宜昌、武昌兵變頻傳，北京外交團亦曾試圖推動宜昌、漢口的軍事中立化，規定通商各埠周圍30華里內不准駐軍，並拆除軍事房舍等。¹⁰而1924-25年間兩次江浙戰爭期間，更因為戰火波及上海租界及上海至海口的安全，為避免影響外人條約權益，列強駐華使領、北京政府先後推動上海中立化方案。藉由深入探究上海中立化問題的中外交涉與決策經過，將可呈現中立化問題所

⁸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豐皇帝》（臺北：聯經，2008），頁291，註25。

⁹ 二次革命期間，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陳其美曾率軍進攻緊鄰租界南側的江南製造局，戰火極可能波及上海租界。為避免戰火影響，列強乃提出中立化方案來確保租界安全。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頁419；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September 5, 1924,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60)(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RLAC*), 893.00/5585.

¹⁰ 關於1920-1921年宜昌、武昌兵變後列強擬推動的通商口岸軍事中立化與設立租界問題，可以參見應俊豪，《丘八爺與洋大人：國門內的北洋外交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9），頁108-122。

牽涉到的複雜內政與國際關係，亦即假中立的中立化，揭露列強嚴守中立立場背後的模糊地帶，進而剖析個別列強對華政策的真實面向。

再者，就列強合作政策而言，華會體系雖然確立了在對華事務上，列強將採取彼此協調合作，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基本立場。然而隨著中國現狀的惡化，內戰頻仍與社會動盪的加劇，在對華事務上，列強的合作政策是否能夠運作無礙？陳劉潔貞(Chan Lau Kit Ching)研究 1923 年山東臨城劫車案，即發現美、英、日間各有顧慮與不同調的情況。¹¹尤其在臨城案善後處置問題上，北京外交團內英、日兩國對立的情況即甚為明顯，導致英國推動的鐵路警備方案胎死腹中。江浙戰爭期間，列強內部是否依然有著各懷鬼胎、不同調的情形？其次，江浙戰爭發生的場景位於上海周圍的淞滬地區，租界的安全與對外商貿的順暢關係到列強在華利益，而上海的地理交通位置又便於列強能夠輕易集結大量海軍艦隻。藉由分析江浙戰爭期間列強動用海軍進行武嚇的標準與限度，將可以明瞭當時列強對華砲艦外交的實際運作情況。

簡言之，本文重點不在於探究江浙戰爭的過程，而是透過江浙戰爭去理解列強如何因應中國內戰對外人利益的危害，進而分析華盛頓會議後列強對華的合作政策與砲艦外交的實際情況。民國以來中國各地內戰何其多，但是對於列強而言，發生在上海附近的戰爭，才真正直接危及到外人在華的核心利益。¹²因此，列強對於此類戰爭的態度與因應之道，比較能夠真實反映出各國對華政策的基本面向，也可以檢驗所謂的華盛頓會議體制，當與日益惡化的中國現狀碰觸時，以美國為首的列強是否依然堅持原先的原則，即尊重中國主權，不動用砲艦干涉中國內政，亦不利用中國現

¹¹ 關於臨城劫車案後的鐵路警備方案爭議，可以參見Chan Lau Kit Ching(陳劉潔貞), "The Lincheng Incident: A Case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Between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and the First Nationalist Revolutio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10(1972), 172-186。

¹² 《泰晤士報》一篇報導即稱：「對外人來說，『如果江浙戰爭不是發生在上海的鄰近地區，這場戰爭或許只是中國永無止境的督軍鬥爭裡，微不足道的一個』」。顯見，發生在上海附近的戰爭，才是江浙戰爭引起外人關注的主要原因。見“Rival War Lords in China,” *The Times*, 11 September 1924.

狀擴大在華利益。換言之，本文研究途徑偏重外部觀點，尤其關注外人眼中的江浙戰爭，以及他們對戰爭的態度與因應之道。

國際關係史、外交史研究最忌諱一國觀點，特別是只使用單一史料的本國史觀，較易落入自我中心、套套邏輯的窠臼。入江昭即稱此類單一語言、單一檔案式的外交史研究，其實意義不大。¹³因此本文在史料的來源上，除了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外，也將運用美、英、日三國的外交、海軍檔案，以及當時的外文報紙，希望透過第一手的資料，來建構上述的外部觀點。其次，本文研究主題限定在 1924-1925 年的江浙戰爭，至於第二次直奉戰爭，因為戰爭規模大、參戰派系多，所影響的亦非一省一地的得失，而是整個中國中央政府的主導權，其中涉及到的中外關係與列強之間的角力也更為複雜，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二、江浙戰爭及其對外人的威脅

以地理區位來說，江浙戰爭主要戰場理應集中在兩省交界之處，對於位處江蘇省內部東南的上海影響應不會太大。然而，緊鄰上海四周、原先應屬江蘇省的淞滬地區，現實上卻是由浙江軍隊所控制，因此使得上海蒙受池魚之殃，捲入中國內戰的戰火之中。回顧歷史，1917 年盧永祥因獲內閣總理段祺瑞重用，委以淞滬護軍使之職，成為上海附近區域實際的統治者，與江蘇督軍幾成抗衡之勢。1919 年盧永祥再獲浙江督軍一職，原先的淞滬護軍使則改由其親信何豐林接任，故淞滬地區仍聽盧永祥號令。¹⁴如此，淞滬地區地理上雖屬江蘇省，但在政治上卻由浙江統轄，並部署重兵防守。職是之故，江浙軍隊一旦發生衝突，交戰的前線勢必從兩省邊界延伸至淞滬地區，迫使上海直接暴露在戰火的範圍內。所以，對於上海的外

¹³ Akira Iriye,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47; 60, note 1.

¹⁴ Civil War between Kiangsu and Chekiang Military Governors, from John K. Davis, American Consul, Nank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6, 1924, *RIAC*, 893.00/56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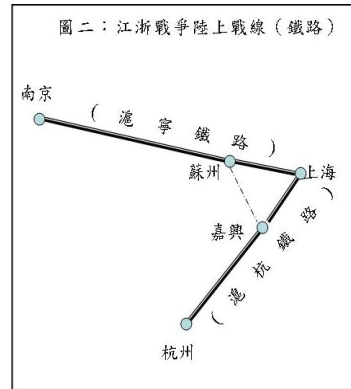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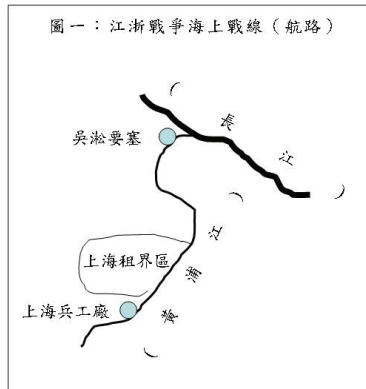
人來說，江浙戰爭絕非事不關己的中國內戰，反倒類似於發生在家門口外的衝突，戰火稍有擴大，隨即可能威脅到租界外人生命財產的安全。

其次，上海也位處江浙戰爭海戰與陸戰戰線最關鍵的戰略位置。以海上戰線而言，吳淞要塞乃扼長江、黃浦江交會處，也是上海出海與往來長江流域的必經水域，江浙海軍勢必爭奪吳淞要塞的控制權。此外，上海租界南方緊臨黃浦江附近的上海兵工廠，則是整個江南地區最為重要的軍火生產基地，亦是江浙雙方必爭之地。¹⁵換言之，上海外人租界往來航路的黃浦江，北段有吳淞要塞，此處發生海戰可能造成上海對外航路的中斷，南段則有上海兵工廠，一旦發生海戰則可能直接波及租界安全，同樣也可能影響輪船航運的安全。(江浙戰爭海上戰線(航路)，請見圖一)另外一方面，就陸上戰線來說，江蘇省會南京與浙江省會杭州，分別經由滬寧鐵路、滬杭鐵路於上海交會，江浙雙方陸軍必將利用這兩條交通要道往前線輸送軍隊，江蘇軍隊將以滬寧鐵路上的蘇州為前線基地，浙江方面則以滬杭鐵路上的嘉興為前陣，如此形成一個向右傾倒的「A」字形。尤其，上海、蘇州、嘉興所形成的小三角區域則將成為江浙陸戰的主要戰區之一。¹⁶(江浙戰爭陸上戰線(鐵路)，請見圖二)

¹⁵ 上海兵工廠即為晚清曾國藩、李鴻章等籌辦的江南製造局，民國時期則改稱為上海兵工廠。關於晚清江南製造局的籌設及其在造砲、製彈上的作用，可以參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196。

¹⁶ Civil War between Kiangsu and Chekiang Military Governors, from John K. Davis, American Consul, Nank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6, 1924, *RIAC*, 893.00/5635.

江浙戰爭海上與陸上戰線示意圖(相對距離不代表實際距離)



資料來源：

圖一：乃筆者根據白吉爾(de Marie-Claire Berg' e)，王菊、趙念國譯，《上海史：走向現代之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頁206附圖，另外繪製的簡圖。

圖二：乃筆者根據 Relative Positions of The Opposing Forces, in Civil War between Kiangsu and Chekiang Military Governors, from John K. Davis, American Consul, Nank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6, 1924, RIAC, 893.00/5635，另外繪製之簡圖。

由上述海(航路)、陸(鐵路)兩圖，不難看出江浙戰爭未來戰事的發展，極可能對上海租界帶來重大危害。因此，當江浙戰雲初起之際，列強以及上海外人均對於此次戰爭感到憂懼與緊張，紛紛預謀因應對策。

(一)江浙戰況

1924年8月28日，江浙衝突日趨激烈，除了陸路交通中斷外，上海對外海上交通也面臨嚴重的威脅。屬於直系的江蘇方面的長江艦隊、福建閩

源艦隊據傳均已出動，開始封鎖上海對外出入港口吳淞。¹⁷統率江蘇(長江)、福建(閩源)兩艦隊的北京政府海軍總司令杜錫珪(1874-1933)¹⁸透過《字林西報》(*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發佈通告，警告所有船隻夜間不得行駛吳淞、江陰。¹⁹另外一方面，隸屬浙江的滬海艦隊(又稱上海獨立艦隊)則巡弋於吳淞、及浙江、江蘇沿岸，並派遣砲艦、魚雷艇駐守瀏河、淞江等地，艦隊司令林建章並下令所有船艦攜帶充足煤礦、食物，全面備戰。²⁰淞滬駐軍亦在上海公共租界北方的閘北地區發佈軍事戒嚴令，實施嚴格的宵禁管制，對往來船隻與人員進行搜查；²¹同時並強化吳淞要塞的防禦工事，部署地雷與重砲，以因應可能來自海上的攻擊。²²浙江方面的淞滬護軍使何豐林正式通知上海海關監督，戰爭即將展開，勢將波及吳淞對外航運。²³何豐林強調

¹⁷ “Naval and Military Heads Here Meet to Adopt Defense Plan,” *The China Press*, 23 August 1924.

¹⁸ 杜錫珪，字慎丞、慎臣，福建閩侯人，早年畢業於南京南洋水師學堂。辛亥革命爆發時任長江艦隊江貞艦管帶，後調任第一艦隊司令。1917-1921年任北洋政府海軍第二艦隊司令官。1923年被授予將軍府瀛威將軍、任海軍總司令。1924年江浙戰爭中，任直系討逆軍海軍總司令。之後歷任北洋政府海軍總長、代理國務總理等職。1929-1931年先後擔任南京國民政府駐日本、歐美海軍視察專員、福州馬尾海軍學校校長等職，1933年病逝於上海。杜錫珪經歷，詳見田子渝、劉德軍主編，《中國近代軍閥史辭典》(北京：檔案出版社，1989)，「杜錫珪」條，頁246。

¹⁹ “Hostilities Believed to Be Unlikely for Another Week,”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8 August 1924;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30, 1924, *RIAC*, 593.00/5487.

²⁰ 〈江浙間に軍艦爭奪戰始まる〉，《東方通信》，第6號(1924.08.1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江浙戰況第一卷，1-6-1/1-0969；“Shanghai Navy Patrols Chekiang Bay,” “Shanghai Navy Patrols High Sea,” *The China Press*, 31 August 1924.

²¹ “Martial Law in Chapei; Strict Rulings Enforced,” *The China Press*, 29 August 1924.

²² “Defense of Woosung is Strengthened in View of Naval Assault,” *The China Press*, 30 August 1924.

²³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Cunningham), Shanghai to Charge'd Affairs(Bell), Peking, August 28, 1924, *RIAC*, 893.00/5569;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30, 1924, *RIAC*, 593.00/5487.

將「採取嚴厲的預防措施來防禦吳淞要塞」，同時因為「擔心在衝突爆發前夕，有中外船隻誤入警戒線，故要求通知港務長發佈警告，船隻應自行注意情況以策安全。」²⁴9月初，何豐林似乎有意與杜錫珪互別苗頭，也正式發佈吳淞附近長江航道的夜間禁航令。²⁵由於江、浙雙方均發佈吳淞附近長江航道的夜間禁航令，間接導致上海對外海上交通的阻礙，形同夜間封鎖。

之後，蘇軍進逼毗鄰上海的昆山，江蘇、福建海軍亦擬協同作戰，預備砲轟黃浦江口的吳淞要塞。²⁶上海、南京間鐵路、通信均告中斷，上海外國領事團緊急協調上海義勇隊(Shanghai Volunteer Corps)²⁷與列強駐滬海軍水兵必要時在上海租界四周布防，以防中國軍隊侵入租界。美國駐華公使館武官也派員前往上海關注戰爭事態。²⁸9月9日凌晨，江浙雙方軍隊在上海西方區域展開戰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立刻透過《大陸報》(*The China Press*)宣布租界進入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稍後又發佈一道禁止中國軍隊

²⁴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er of Defense of Sunkiang and Shanghai, cited from Letter from the Superintendent of Customs, August 27, 1924, *RIAC*, 593.00/5585.

²⁵ Letter from the Commissioner of Defense of Sunkiang and Shanghai, cited from Letter from Special Envoy for Foreign Affairs to American Consul-General and Senior Consul, Shanghai, September 2, 1924, *RIAC*, 593.00/5585; 〈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 其三(1924年9月4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131騷亂止，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000。報載的中文版戒嚴令，與英文版略有出入，「2日……何護軍使，於其管轄區域內布戒嚴令：吳淞上下流各15英里……離吳淞砲台6英里之區間，自日未至日出，禁止外國船舶通行」。見〈吳淞附近禁止外艦通行〉，《晨報》(上海)，1924年9月6日，3版。

²⁶ “Chekiang Troops and Position,”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 September 1924.

²⁷ 1853年，英、美駐上海領事為因應太平軍亂事，乃召集上海租界僑民會議組成上海義勇隊，英國僑民一律納編，目的為協助海軍防衛租界安全。之後義勇隊改隸屬上海工部局，而且除原先的英國隊外，又陸續成立日本隊、美國隊、中華隊、俄國隊，並設有運輸、通信、防空、鐵甲車等特殊部隊。見石源華，《中華民國外交史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上海義勇隊」條，頁20-21。

²⁸ Consul-General(Cunningham), Shanghai to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September 3, 1924, *RIAC*, 893.00/5489; American Legation at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3, 1924, *RIAC*, 593.00/5492.

侵入租界的警告命令。²⁹英、美、日、法、義五國海軍陸戰隊則正式登岸，與上海義勇隊分區守備，一同防衛上海租界。³⁰

江浙戰爭中雙方可以動員的陸軍部隊，姑且不論其他直系援軍，僅江浙兩省，大約各有約 3 萬人上下，³¹如果再加上源源不絕、持續增援的直系軍隊在上海附近集結戰鬥，自然令外國駐滬領事與海軍部門感到擔心與憂慮。上海英文報紙《上海泰晤士報》(*The Shanghai Times*)特派員即親赴昆山附近，實際觀察江浙戰鬥過程，認為江浙戰爭是一場「真正的戰爭」，砲彈如雨，雙方往來衝鋒與防守，戰況激烈。³²

(二) 戰爭陰影

戰爭期間江浙雙方大幅動員海軍，準備在上海附近海域進行作戰，除了對於停泊在上海的各國船隻以及往來通航的商船造成嚴重威脅外，更會

²⁹ “State of Emergency is Declared in Settlement; Defense Force on Guard,” *The China Press*, 10 September 1924.

³⁰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State of Emergency Declared in Settlement of Shanghai, Consul-General(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0, 1924, *RIAC*, 893.00/5588；〈瀏河寧浙軍盡出〉，《東方通信》，第15號(1924.09.09)，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江浙戰況第一卷，1-6-1/1-0970；〈上海岡村中佐ヨリ參謀總長宛(1924年9月9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江浙戰況第二卷，1-6-1/1-0970。

³¹ 〈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 其一(1924年8月29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131騷亂止，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000。

³² “General Chi Hsieh-Yuan Preparing for Big Offensive against Chekiang Line,” *The Shanghai Times*, 11 September 1924. 《上海泰晤士報》是由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出資支持的英文報紙，故在立場上偏向日本利益。見 Foreign Owned Press in Shanghai: Current Events Report, November 16, 1921, War Department (United States), *Correspondence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 Relating to Gener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Conditions in China, 1918-1941* (RG165,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MID)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987), 2657-I-220.

影響到上海進出口貿易的順暢，造成外商的重大損失。1924年8月29日，《字林西報》即報導江蘇、福建方面海軍準備圍攻上海的消息；³³日本《時事新報》根據日本郵船的電報消息，認為戰爭爆發前夕，上海金融秩序即已動盪不安，商業活動呈現停滯狀態，一旦戰爭爆發，如航路中斷，貨物輸出入斷絕，勢必將對上海金融貿易造成巨大的損害。³⁴美國駐上海總領事給國務院一份「內戰影響上海貿易」的報告中，則詳盡分析江浙戰爭對上海進出口貿易活動所造成的重大衝擊。戰爭爆發前後，上海對外航路或許仍能維持，但是上海與內地長江流域的航路卻勢必受到戰事波及而告中斷。影響所及，由外商進口、原先藉由上海轉運內地的貨物只能大量堆積在上海的倉庫內。尤其因為江浙戰雲密布，導致當地銀行緊縮銀根，停止放款或是大幅提高利率，華商資金周轉不靈，無力購買外商進口至上海的貨物，況且就算資金無虞，但受到水陸交通中斷的影響，也無法轉賣至內陸地區，故本地華商紛紛停止向外商進貨。除了進口的洋貨無法經上海轉運內地外，內地的土貨也同樣無法經上海出口外國。長江下游地區的船隻泰半遭到軍隊的徵用，在缺乏充足運輸工具的情況下，使得華商無法準時將土貨運送至上海。尤有要者，土貨運送的拖延也造成違約情況出現，導致中外商務糾紛四起。³⁵總之，江浙戰爭將嚴重影響到上海的內外貿易：

無論江浙衝突未來的發展如何，事實上它已經對上海本季的貿易造成了無法估計的損失：由於戰爭所導致的銀行與航運混亂，將影響

³³ “Nanking Troops on the March,”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9 August 1924. 依據日本駐北京武官從北京政府海軍部獲知的消息，福建艦隊調派北上支援作戰的共有4艘軍艦。福建省長薩鎮冰亦曾親口告訴日本駐福州領事，有4艘軍艦出發前往寧波。見〈在支公使館附武官ヨリ軍令部次長宛(1924年8月28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130騷亂，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297100；〈在上海武官ヨリ軍令部次長宛(1924年8月28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130騷亂，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297100。

³⁴ 〈不安漲る上海財界：商取引は休止状態、船舶の航行注意〉，《時事新報》(上海)，1924年9月2日。

³⁵ 上海商界即開始激烈爭論因江浙戰爭而導致的貨物延遲或無法送達等違約情況，究竟是否適用所謂的「不可抗力」條款。

到進出口貿易。進口商認為即使戰爭能在短期內結束，上海的經濟情況也要等到農曆春節之後才會好轉。出口商也持相同的悲觀看法。³⁶

無怪乎上海外人普遍強烈感受到江浙戰爭所帶來的威脅與可能造成的重大貿易損失。

據統計，江浙雙方海軍實力，如全數動員，總軍艦數量可達近 30 餘艘。江蘇方面可動員的艦隻數量(含江蘇艦隊 20 艘、福建艦隊 9 艘，共約 29 艘)，實力遠高於浙江海軍(約 6 艘)。³⁷而依據日本第一遣外艦隊 1924 年 9 月初的觀察，江蘇方面實際動員的軍艦約有 11 艘、福建支援北上的軍艦有 4 艘(分駐南京、江陰、瀏河等地)，合計 15 艘，包括 2 巡洋艦、8 砲艦、1 運送艦、4 水雷艇。浙江方面則是 6 艘(均在黃浦江內，分守高昌廟、吳淞)，其中有 1 巡洋艦、2 砲艦、1 運送艦、2 水雷艇，雙方實力差距不小³⁸。可見江蘇方面的海軍總司令杜錫珪的確有力量可以封鎖上海，³⁹而這也是北京公使團、上海領事團最擔心之事。因為如果雙方海軍在上海附近發生海戰，必將危害上海港航運安全，尤其是江蘇海軍如果進攻吳淞口要塞，或是福建海軍溯江而上砲擊上海兵工廠，更可能波及上海租界的安全。此外，除了長江、

³⁶ Civil War Affects Shanghai Trade, from Consul-General, Shanghai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Legation, Peking, September 8, 1924, *RIAC*, 893.00/5599.

³⁷ 江浙雙方海軍實力，可以參見〈江浙海軍比較〉，《晨報》(上海)，1924年9月1日，2版；古蔣孫著，劉本軍標點，《甲子內亂始末紀實》，收錄在來新夏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第4冊，頁239-242；〈東南戰局中兩方兵力之調查〉，《東方雜誌》，第21卷第17期，頁146-147。

³⁸ 〈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 其一(1924年8月29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131騷亂止，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000；〈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 其四(1924年9月7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131騷亂止，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000。

³⁹ 英報即戲稱浙江艦隊戰力不佳，只有「兩艘小的驅逐艦，與幾艘鐵製與木製的砲艦。驅逐艦在深海地區一定會沈沒，而砲艦(除了部分外)……僅是木製的內河巡邏艇，配備老舊的機槍，除了嚇嚇無知的村民，幾乎沒有戰鬥力。……作為現代戰鬥艦，浙江艦隊是微不足道的。」“The Independent Fleet,” *The Times*, 23 September 1924.

福建海軍外，吳佩孚甚至還試圖動員山東青島的海軍，一併加入圍攻浙江的行列。⁴⁰一場風雨欲來的海上大戰，似乎將在上海附近發生。

最後，江浙戰爭也為上海租界帶來了為數甚多的不速之客：中國難民。尤其地方軍事當局在租界外圍地區強徵苦力與士兵的行為，導致大量中國百姓紛紛躲進外人產業或是租界內，以免除軍方徵調。⁴¹據統計，從 1924 年 9 月 1 日起，每日湧入上海租界的人數約在 6000-7000 人，大量的難民形成嚴重的飲食與住宿問題。公共租界當局被迫緊急修建難民營，甚至考量將難民隔離，以因應局勢發展。而更令外國領事擔心的是，戰爭衝突之後，戰敗撤退或潰散的軍隊，萬一湧入租界，勢將形成更為嚴重的治安問題。尤其是江浙雙方參戰的陸軍人數高達數萬人之眾，一旦敗軍闖入上海租界，非同小可，屆時恐需外國海軍的協助，派遣陸戰隊登岸，防衛租界與外人生命財產的安全。⁴²

⁴⁰ 根據日本駐山東濟南武官的報告，洛陽方面(吳佩孚)曾支助山東青島渤海艦隊軍費 30 萬，不過因艦隊軍艦大部均在修理中，僅海圻艦可以動用。見〈濟南菊池少佐ヨリ參謀次長宛(1924年9月10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江浙戰況第二卷，1-6-1/1-0970。《晨報》亦稱渤海艦隊「年久失修，幾不能駛，驟令開拔，恐亦非易事」，「名為七艘，實則僅海圻可用，然渤海之防務，恐未使擅離也」。但稍後，據傳海圻艦還是將調動「協攻吳淞口」。見〈江浙風雲與渤海艦隊〉，《晨報》(上海)，1924年9月3日，3版；〈渤海艦隊之實力〉，《晨報》(上海)，1924年9月4日，3版；〈海戰亦不可免耶：吳淞形勢愈緊張〉，《晨報》(上海)，1924年9月6日，2版。

⁴¹ “Sharp Fighting in China,” *The Times*, 6 September 1924. 租界以外的外人產業即常常遭到軍隊闖入強徵中國苦力。上海領事團、租界工部局均認為，雖然在租界之外，但是軍隊闖入外人產業內搶抓民夫的行為，仍抵觸條約規定。見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1, 1924, *RIAC*, 893.00/5594.

⁴² 依據美方的估算，江浙戰爭雙方實際參與戰鬥的總人數約 25000-40000 人之眾。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September 8, 1924, *RIAC*, 893.00/5587；〈第一遺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 其三(1924年9月4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 131 騷亂止，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000。

三、列強駐滬海軍實力與武嚇行動

(一)海軍實力

江浙危機發生以來，列強駐滬海軍的大幅增援以及聯合行動，勢必對江浙雙方以及直系當局產生一定程度的嚇阻效用。⁴³

隨著戰鬥的爆發，列強部署在東方的海軍就開始集中上海。超過 20 艘的軍艦已經停泊在吳淞到龍華兵工廠之間的黃浦江上，一旦外人產業遭到攻擊或受到江浙雙方軍隊的威脅，將動用武力。⁴⁴

北京政府外交部即曾因報載外艦調動頻頻，擔心列強將動用武力干涉而緊急電致上海、煙台、金陵等地交涉員，詢問外艦行動。⁴⁵而從 1924 年 9 月 7 日美國亞洲艦隊司令給海軍作戰部的報告中，即可以清楚看到江浙戰爭期間列強實際部署海軍武力的大致情況與流露出的自信：

在上海及其周圍地區總共有 22 艘軍艦，在上海有 4 艘日本軍艦、4 艘英國軍艦、8 艘美國軍艦、2 艘法國軍艦與 1 艘義大利軍艦，加上吳淞有 1 艘美國驅逐艦及其他軍艦部署。另外還有為數 1200 人、充足的混合武力準備登陸。美國指揮官已準備登陸一支超過 300 人的部隊以及 150 人的後備部隊，這還不包括修蒙號運輸艦(USS *Chaumont*)上的海軍陸戰隊。目前不再需要其他的武力或設備的增

⁴³ 《晨報》甚至宣稱「北京外交團傳出消息，據稱各國在華軍艦，現基於上海領事團之要求及本國海軍部之訓令，已開始向黃海、東海、吳淞方面出發……其中僅美國艦一項，已佔 28 艘，合之其他各國軍艦，共有八十艘之多」。此數據雖然過於誇大，但是列強海軍持續增兵的消息，勢必帶給江浙雙方一定程度的壓力。見〈各國大調軍艦〉，《晨報》(上海)，1924 年 9 月 3 日，第 2 版。

⁴⁴ “Foreign Protection for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3 September 1924.

⁴⁵ 〈外交部電上海、煙台交涉員(外艦開赴上海事)(1924 年 8 月 29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3-001；〈外交部電金陵交涉員(外艦有無開到下關由)(1924 年 8 月 29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3-002。

援，上海外人也都不擔心戰爭的情況。⁴⁶

依據 1924 年 9 月初的統計，為了因應江浙戰爭，必要時可以動用海軍武力保護上海租界安全，英、美、法、日、義五國也增調大批軍艦集中上海，總計在上海派駐了二十餘艘軍艦，其中尤以美國海軍的十餘艘為最。⁴⁷此外，日本海軍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鑑於美、英海軍均大幅增兵上海，也建議海軍部緊急增派龍田號巡洋艦以及第 28 驅逐艦隊趕往上海，以便與英美抗衡。⁴⁸除了海軍艦艇之外，各國海軍陸戰隊以及上海義勇隊，也依照 9 月初事先協調好的方案，各自分區駐防，共同保護上海租界，防止內戰敗軍竄入租界內部滋事。⁴⁹總計 20 餘艘軍艦，加上 3000 人左右的陸上武力，

⁴⁶ Commander-in-Chief, Asiatic Fleet to Naval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7, 1923, *RIAC*, 893.00/5599.

⁴⁷ 上述五國海軍艦隻暨陸上分遣隊部署情況，乃依據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給北京公使館、國務院的報告，見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September 3, 1924, *RIAC*, 893.00/5561;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September 9, 1924, *RIAC*, 893.00/5504. 美方數據與日本方面的統計略有出入，根據日本海軍統計的陸上武力情況為：美軍 400 人、英軍 400 人、日軍 400 人、義軍 100 人、法軍 250 人、上海義勇隊 1200 人、上海警察武力 700-800 人，總計約 3450-3550 人。見〈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 其三(1924年9月4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 131 騷亂止，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000。

⁴⁸ 〈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ヨリ軍務局長宛(1924年9月1日)，江浙問題に関する件(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 130 騷亂，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297100。日本海軍部稍後同意先派遣龍田艦趕往上海。該艦預計 9 月 3 日上午 10 點從佐世保軍港出發，9 月 4 日下午 5 點抵達上海。屆時日本駐滬海軍將有 2 巡洋艦、2 砲艦，共計 4 艘。見〈佐世保鎮守府參謀長ヨリ軍務局長宛(1924年9月2日)，江浙問題に関する件(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 130 騷亂，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297200。

⁴⁹ 關於各軍部防協調情況，見英國長江巡邏隊司令給各軍司令與領事的命令。Order from Rear Admiral Anderson to the Japanese Rear Admiral, the United States Admiral, United States Consul General, British Consul General, Japanese Consul General, French Consul General, for Information, September 1 & 4, 1924, *RIAC*, 893.00/5588.

構成上海租界堅實的防衛力量。尤其駐滬海軍艦艇中，不乏戰力較為強大的巡洋艦與驅逐艦，確實構成強大的威嚇力量。

再者，從浦東地區安全問題的處置上，也可以看出列強海軍在保護外國利益上的主動性與積極性。浦東與上海外國租界隔著黃浦江相望，不屬於租界範圍，但早已成為上海主要的製造與碼頭、倉儲中心。經由上海進行對外貿易往來的貨物多半都在浦東起卸，故許多外商均在此地擁有碼頭與倉庫。換言之，位於租界之外的浦東，已是重要的外商利益地區。受到江浙戰爭威脅的心理因素影響，雖然浦東地區並未實際遭到戰火波及，但貨物保險費率已經有所反應，上漲約 5%，外商得付出更多的經營成本。於是在外國商會的請願下，列強海軍即決定主動派遣軍艦與武裝人員進駐浦東地區的外商碼頭與重要據點。上海領事團後來也認可了海軍的行動。⁵⁰

(二)海軍武嚇行動：溫和型砲艦外交的展現

1924 年 9 月 4 日，上海領事團開會討論如何因應中國當局片面下達的長江下游夜間禁航令，最後決定以「一種友善的方式」，要求「江浙雙方撤銷禁航令，同時允諾不在黃浦江使用海軍艦隻」。⁵¹所謂的「友善的方式」，說穿了，其實就是以海軍武力為後盾的外交恫嚇，一種溫和的砲艦外交交涉模式。上海領事團採取的措施是：一方面由上海領事團與駐滬海軍直接跟浙江方面的淞滬護軍使何豐林施壓，另外一方面則由英國、美國駐南京領事跟江蘇方面的海軍總司令杜錫珪交涉，以期雙方均能撤銷長江下游地區的夜間禁航令。⁵²為了強化抗議照會的效力，給與江、浙雙方當局壓力，

⁵⁰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1, 1924, *RIAC*, 893.00/5594.

⁵¹ British Consul-General to American Consul-General, Shanghai, September 7, 1924, *RIAC*, 893.00/5592.

⁵² Letter from Senior Consul to the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5, 1924, *RIAC*, 893.00/5592. 內容大致相同的外交恫嚇照會，先後由英國、美國駐南京領事交與海軍總司令杜錫珪。見 Paraphrase of Telegram, American Consular-General, Shanghai to American Consul Nanking via U.S. Naval Radio, September 10, 1924,

部分列強海軍軍艦隨即停泊於黃浦江與長江交會處的吳淞，透過列強海軍的在場與實力的展現，凸顯列強維護上海對外交通順暢的決心。⁵³

外交與砲艦的雙重施壓，果然成功迫使江、浙雙方軍事當局改變態度，從原先高調片面下達長江封鎖令，轉趨低調地限定作戰範圍。江蘇、浙江雙方海軍司令即通知駐防上海警戒的美國長江巡邏隊指揮官麥凱維(Charles V. McVay)，明白承諾不會在黃浦以及上海租界附近展開軍事行動。⁵⁴浙江方面的淞滬護軍使何豐林以及江蘇方面的海軍總司令杜錫珪，稍後也向美國亞洲艦隊司令，⁵⁵以及美國駐滬總領事表示同意黃浦江地區中立化，也允諾撤銷長江下游與黃浦江地區的封鎖令。美國駐華公使館對於這樣的結果，已感到非常滿意。⁵⁶

此外，美國駐滬總領事克寧漢(Edward Cunningham)給公使館的報告中，也表示雖然上海附近戰雲密布，鐵路交通、電報聯繫均告中斷，但是外人如果乘坐外籍船隻前往其他各地，仍是相當安全的。⁵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也認為上海安全無虞。⁵⁸美國商會給美國國務院遠東司的報告中，亦引用來自上海美商商會的電報，強調「美國報紙明顯過於誇大上海的情況，

RIAC, 893.00/5592.

⁵³ Telegram from Acting British Consul-General at Shanghai to British Consul, Nanking, September 5, 1924, *RIAC*, 893.00/5592.

⁵⁴ 美國長江巡邏隊指揮官給亞洲艦隊司令的報告，見Commander-in-Chief, Asiatic Fleet to Naval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7, 1923, 893.00/5599.亦可參見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8, 1924, *RIAC*, 893.00/5499.

⁵⁵ Commander-in-Chief, Asiatic Fleet to Naval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2, 1924; Acting Secretary of the Navy to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7, 1924, *RIAC*, 893.00/5536.

⁵⁶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1, 1924, *RIAC*, 893.00/5509.

⁵⁷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September 3, 1924, *RIAC*, 893.00/5561.

⁵⁸ 工部局總董特別授權美國總領事對外說明租界的情況。見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8, 1924, *RIAC*, 893.00/5587.

目前條約口岸的美人生命財產並無遭到威脅之虞，(美國使領、海軍)也已經有的適當的保護措施」。⁵⁹顯見列強最重視的上海外人生命財產安全與對外航路交通，均未受到江浙戰事的波及。英國外交部也評估，上海外國租界有外國軍艦駐防，加上外國官員領導的警察，以及上海義勇隊兵力，實無庸擔心租界的安全。⁶⁰換言之，在列強海軍武力的強力監視之下，江浙雙方海軍應不至於在上海附近爆發戰鬥。⁶¹

(三)駐華使領與海軍之間的歧見：海軍武嚇行動的尺度

江浙戰爭期間，列強海軍與使領機構對於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安全的限度，其實有著不太相同的標準。確保租界內部的安全當然無庸置疑，但是對於租界之外的外國產業該不該保護，什麼時機該保護，領事官員與海軍官員態度就有所差異。以美國為例，領事官員的普遍看法是當租界以外的外人生命財產明顯遭到危害時，才被動使用海軍武力；⁶²而部分海軍官員的態度則是不管情況如何，直接跨越租界之外，主動去保護所有外人利益。⁶³這或許即是外國使領與海軍的差異所在。

⁵⁹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s, September 11, 1924, *RIAC*, 893.00/5545.

⁶⁰ Hostilities in Kiangsu and Chekiang, August 28, 1924, *FO*, 371/ 10243.

⁶¹ 《晨報》亦引述上海某快訊，稱「一般人俱信海軍攻滬一節，因各國軍艦分集上海，一時不致實現，如果戰事延長，雙方海軍縱須決一勝負，亦必在上海之外」。松滬護軍使何豐林的秘書，亦對外報記者坦言：「(江蘇)海軍之目的，不過為奪取上海之用。但因外艦群集上海保護外僑，則江浙海軍之衝突亦無所用」，見〈閩蘇艦隊之行動：海軍或不發生戰事〉，《晨報》(上海)，1924年9月4日，2版；〈何豐林口中之江浙軍形勢觀：前線浙軍數目較少、海軍一時可無衝突〉，《晨報》(上海)，1924年9月4日，2版。

⁶²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8, 1924, *RIAC*, 893.00/5590.

⁶³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8, 1924, *RIAC*, 893.00/5587.

例如五國駐華海軍部門，⁶⁴即曾與美國公使館發生過相當大的歧見。1924年9月4日，英、美、日、法、義五國駐滬海軍指揮官召開會議，決定：絕不容許江、浙雙方干涉長江下游地區的外國航運，⁶⁵特別是外國商船無論日夜均得自由航行，如遭到攻擊，列強將動用武力反擊，責任則由江浙雙方自負。⁶⁶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即十分認同上述五國海軍會議的決議，在給海軍部的報告中，強調「這是防止戰火波及外人生命財產最有效的方法」。⁶⁷然而，此項決議卻遭到美國公使館的質疑，代辦貝樂(Edward Bell)認為列強動用海軍武力應侷限在兩種情況：一是江浙雙方在黃浦江內戰鬥、二是江浙雙方戰火波及租界安全。這也是四國公使在8月30日拜會外交總長顧維鈞時所明白提示的兩項基本要求。⁶⁸至於江浙海軍片面發佈的長江下游夜間禁航令，雖然嚴重侵害到條約列強所享有內河航行權，但是江浙戰爭期間，列強是否應該動用海軍武力來維護長江下游航運順暢，則值得商榷。⁶⁹美國國務院則態度與駐華公使館較為一致，除了為保護上海地區美國人命生命財產安全外，不贊成任意動用海軍武力。⁷⁰

其次，對列強駐滬海軍來說，上述江浙兩軍的口頭承諾與保證，並無

⁶⁴ 五國駐滬海軍乃是由英國長江巡邏隊司令安德森(Rear Admiral M. Anderson)出任聯軍總指揮官。“State of Emergency is Declared in Settlement; Defense Force on Guard,” *The China Press*, 10 September 1924.

⁶⁵ 此即江浙海軍宣布的長江下游航道夜間禁航令，從長江出海口上溯80哩的範圍。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6, 1924, *RIAC*, 893.00/5495.

⁶⁶ 〈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ヨリ軍務局長宛(1924年9月4日)，江浙問題に関する件(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130騷亂，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297200。五國駐滬海軍此項決議，將待各國政府確認與授權後生效。

⁶⁷ Commander-in-Chief, Asiatic Fleet to the Secretary of Navy, September 6, 1924, *RIAC*, 893.00/5599.

⁶⁸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30, 1924, *RIAC*, 893.00/5485.

⁶⁹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6, 1924, *RIAC*, 893.00/5495.

⁷⁰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erican Legation at Peking September 6, 1924, *RIAC*, 893.00/5495.關於國務院對於海軍動武的看法與分析，詳後述。

法消除戰事可能波及上海的疑慮。為了進一步確保上海周邊地域的安全，五國海軍官員又於 1924 年 9 月 8 日在上海開會討論因應之道，最後決定毗連上海租界的吳淞要塞必須中立化，亦即現在駐防吳淞要塞的浙江軍隊必須撤出要塞，改懸掛上述五國國旗，藉此將可以消弭江蘇海軍進攻吳淞要塞的口實，如此江浙戰火將不致影響到上海租界。然而，五國駐滬海軍的決議，很明顯的將違背美國嚴守中立、不干涉中國內政(內戰)的基本立場。因為吳淞要塞靠近黃浦江與長江會合地帶，控制了上海對外海上交通咽喉，雖然戰略地位極其重要，但該區完全不屬於上海租界範圍。五國海軍如果威逼浙江軍隊撤離中國領地上的吳淞要塞，甚至派遣外國軍隊進駐要塞，並在其上懸掛外國國旗，不啻是介入中國內戰、干涉內政的行為，同時也逾越美國國務院所確定的海軍任務份際：保護上海租界安全與維持上海對外海道暢通。因此，美國駐華公使館反對五國海軍的決議，也立即將此情況電告國務院。⁷¹

再者，美國海軍亞洲艦隊司令給公使館的電報中，也提及他已要求正前往上海增援的兩艘美國驅逐艦，在途經吳淞要塞時，派出海軍官員與駐紮此地的浙江海軍接洽，表明列強海軍將不會同意江蘇海軍進入黃浦江，也不准許在黃浦江地區有任何作戰砲擊行動。然而，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卻注意到，列強海軍並沒有同時向江蘇海軍提出相對應的保證與要求。如此，將會造成一種負面的印象與不好的後果：列強海軍在江浙派系戰爭中，似乎偏向浙江，協助其抵禦江蘇方面的進攻；如此將嚴重違背美國嚴守中立、不介入內戰的立場。⁷²

與此同時，英、美、日、法、義五國公使也在北京開會討論，決定對列強海軍動武尺度進行規範：

五國公使認為，海軍武力的使用應該侷限在保護上海城鎮、黃浦江

⁷¹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2, 1924, *RIAC*, 893.00/5518.

⁷² Notes by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1, 1924, *RIAC*, 893.00/5600;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erican Legation at Peking September 13, 1924, *RIAC*, 893.00/5518.

以及出海口的安全。假如長江下游的通航遭受到阻礙，海軍動武應僅限於在維持長江口及上海至出海口的日夜通航權。五國公使並不贊同海軍指揮官所提要派遣國際特遣隊佔領吳淞要塞，並在其上懸掛五國國旗的建議。⁷³

為了避免美國駐滬海軍逾越或抵觸上述原則，國務院特別通知海軍部，一面認可美國駐華公使館反對五國海軍進駐吳淞要塞計畫的立場，另一方面也希望「在戰爭並未對外國生命財產安全構成立即威脅之前，列強海軍當局不應該禁止中國海軍艦隻進入黃浦江，除非該行動危及到外人的生命財產」。⁷⁴

列強駐滬海軍稍後接受美國政府與五國公使建議的基本方針，即避免實質性干涉中國內政、介入內戰，或是在內戰中偏袒其中任何一方。因此，五國海軍改弦易轍不再要求浙江海軍撤出吳淞要塞，而是採用另一種方式，使得江浙雙方海軍不在黃浦江內動武。⁷⁵1924年9月16日，上海五國資深海軍軍官會議中，正式決定分別對江蘇與浙江方面的海軍遞交通牒。由駐守南京的英國資深海軍軍官，負責拜訪江蘇方面的海軍司令杜錫珪，並交付下列通知：

在上海的英、日、美、法、義五國海軍資深軍官，決定為了維護黃浦江的中立化，不准許江蘇海軍艦隻進入黃浦江。同時，他們也告知浙江方面的海軍司令林建章，浙江海軍不得在黃浦江內開砲，而且浙江海軍船艦一旦離開黃浦江將不得再駛回黃浦江內。

另外一方面，美國海軍巴克號驅逐艦(USS Destroyer *Barker*)則傳送下列訊息

⁷³ 五國公使決議見Employment of Force in the Whampoo, a telegram communicated by the Italian Consul-General and Senior Consul to the Consul-General for America, France, Japan and Great Britain, September 16, 1924, *RIAC*, 893.00/5640.

⁷⁴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September 12, 1924, *RIAC*, 893.00/5536A.此外，美國國務卿還將9月12日駐華使館反對五國海軍計畫的報告，以及9月13日國務院給駐華使館的訓令一併當作附件送交海軍部，以表明國務院不贊成海軍介入中國內戰的基本立場。見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the Navy, September 13, 1924, *RIAC*, 893.00/5518.

⁷⁵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9, 1924, *RIAC*, 893.00/5603.

給在黃浦江口的浙江方面海軍司令林建章：

除了不准在黃浦江內開砲之外，五國海軍資深軍官決定浙江海軍船艦一旦離開黃浦江將不得再駛回黃浦江內。同時，五國海軍也已告知江蘇方面的海軍司令杜錫珪，不准許江蘇海軍艦隻進入黃浦江。⁷⁶

在五國海軍可能直接介入的壓力下，稍後江蘇、浙江雙方海軍司令均回覆同意接受上述規定，黃浦江的中立化因此獲得確保。⁷⁷換言之，列強海軍以強大的海軍武力為威嚇手段，一方面限制了黃浦江內浙江海軍的軍事行動，二方面則將進攻上海的江蘇海軍擋於黃浦江之外。如此，江浙雙方海軍勢必無法在黃浦江內發生戰鬥，從而也可以避免戰火波及上海租界。藉由此法，列強海軍既可以在嚴守中立、不介入中國內戰的情況，同時確保上海租界的安全。⁷⁸

(四)江浙戰爭的結束與列強海軍武嚇行動的作用

1924年9月下旬，原先戰況膠著的江浙戰事漸趨明朗，直系孫傳芳從福建攻入浙江，造成盧永祥極大的壓力，陸戰部份也呈現直軍進逼、浙軍後撤的基本態勢。戰爭勝負眼看大致底定，原先在瀏河附近對峙的江、浙雙方海軍，似乎也沒有繼續作戰的必要，開始私下接觸：江蘇方面擬出錢招降納叛，浙江方面的滬海艦隊也準備見風轉舵，評估改投江蘇的可能性。根據日本海軍的報告顯示，9月24日江蘇方面的楚有艦艦長向駐防南京的日本安宅艦艦長表示：江蘇方面正與駐守瀏河的海籌、永績、建康、列字號水雷艇等四艘滬海艦隊所屬船艦洽談合作之事。9月27日，仍停泊在黃浦江內高昌廟附近的浙江方面辰字號水雷艇，在列強海軍指揮官的要求

⁷⁶ Charles B. McVay,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Force to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September 16, 1924, *RIAC*, 893.00/5640.

⁷⁷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9, 1924, *RIAC*, 893.00/5603.

⁷⁸ 美國駐華公使館即讚揚列強海軍此舉符合了國務院堅守「中立」的基本立場。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7, 1924, *RIAC*, 893.00/5532.

下，已解除武裝，另一艘靖安艦據傳則已將艦上火砲拆移至陸上使用。9月30日，滬海艦隊的建康艦艦長，則在鎮江告訴日本海軍勢多艦艦長：「中國海軍並無上海、南京的區別，江浙戰爭不過是齊盧之間的私鬥，與海軍並無關係」。⁷⁹換言之，滬海艦隊原有的6艘船艦中，4艘已與江蘇暗通款曲、2艘則已解除武裝。10月初，浙江軍隊因為彈藥短缺、戰志低落，加以內部將領心有二志、指揮困難，最終導致戰線失守，浙軍全面潰敗。盧永祥、何豐林等亦從前線避入上海租界，準備逃往日本。⁸⁰潰逃的浙江軍隊，部分則竄入上海租界附近，一度讓駐防的外國海軍陸戰隊提高警戒。⁸¹

有趣的是，1924年10月初，即便在浙江方面海軍艦隻紛紛倒戈，敗局已露之際，列強依然以海軍武力持續貫徹黃浦江的中立化，以至於江蘇方面的海軍司令杜錫珪遲遲無法率領艦隊進入黃浦江。列強海軍的態度是：除非江浙戰鬥完全停止，否則黃浦江中立狀態仍將持續下去，江蘇海軍亦不得進入黃浦江內。為此，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還特地與英、美公使交涉，認為黃浦江內已無浙江海軍艦隻，亦無爆發海戰的可能，希望列強同意江蘇海軍進入黃浦江內，以便促使佔據上海兵工廠、負隅抵抗的浙江軍隊能盡早投降，有助於戰爭的提早結束。但英、美公使還是堅持黃浦江的中立化，聲稱如同意顧維鈞的要求，將引起浙江方面的反對，從而可能

⁷⁹ 〈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2) 其十(1924年9月26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131騷亂止，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100・C08051300200；〈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3) 其十一・十二(1924年9月30日、1924年10月3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131騷亂止，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200。此外，根據路透社的消息，滬海艦隊在9月21日離開上海，準備倒戈投向直系，見“The Independent Fleet,” *The Times*, 23 September 1924. 關於浙江海軍倒戈一事，亦可參見美國長江巡邏隊的報告，見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9, 1924, *RIAC*, 893.00/5603。

⁸⁰ 〈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3) 其十五(1924年10月15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131騷亂止，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200。

⁸¹ 〈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ヨリ海軍次官、軍令部次長宛(1924年10月13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江浙戰況第四卷，1-6-1/1-0970。

危及上海租界與對外航路的安全。最後，江蘇海軍還是被列強拒於黃浦江之外。⁸²由此不難看出，列強海軍武力在上海附近水域的有效壓制力量，中國任何派系的海軍，無論戰勝或失敗，均不敢捋列強海軍之威。

簡單來說，在列強駐華使領的密切關注與砲艦外交的展現下，江浙戰爭除了造成金融秩序的波動與中國難民的湧入之外，其實並未帶給上海外人太多的困擾。連原先最擔心、可能危及上海租界安危與對外海路交通的江浙海軍大戰，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因為在外國艦隊的嚴密監視下，實力較為強大的江蘇方海軍，不過僅是象徵性地進行掩護射擊，浙江艦隊更是侷限在黃浦江內警戒，並未積極參與戰鬥，可見雙方海軍均不敢大動干戈。⁸³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即報告，只要「外國艦隊在場」，江浙雙方應不致爆發海戰。⁸⁴「列強海軍在場」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一場曾令上海外人極度擔憂、害怕的江浙海軍大戰，自此宣告結束。這樣的結果，也意謂列強海軍原先的顧慮與偏向積極的武力干涉政策，似乎太過高估江、浙海軍的戰鬥意志，同時也過於低估自己的影響力，即「列強海軍在場」與對於中國軍隊的重要宣示意義。究其實際，江浙戰爭期間先後發佈了三種禁航令：江蘇方面海軍總司令公佈的長江下游中外船隻夜間禁航令、浙江方面淞滬護軍使的長江下游中外船隻夜間禁航令，以及列強海軍的黃浦江內江浙海軍禁航令(即黃浦江禁止戰鬥令：江蘇海軍不准進入黃浦江、浙江海軍則不得在黃浦江內動武，一旦駛離即不得再入)。而最後真正有效實行且貫徹到底的，只有列強海軍的禁航令。因此，列強海軍才是上海附

⁸²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9, 1924, *RIAC*, 893.00/5603。

⁸³ 〈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 其五(1924年9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131騷亂止，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000。

⁸⁴ 〈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 其六(1924年9月13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131騷亂止，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000；〈北京坂西中將ヨリ參謀次長宛(1924年9月10日、1924年9月11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江浙戰況第二卷，1-6-1/1-0970。

近水域真正的主人。如同美國長江巡邏隊指揮官給亞洲艦隊司令報告中所揭露的自信：「貫徹中立化是必要的……(需要時)可以使用武力，而美國海軍艦隊有足夠的力量，來貫徹決議」。⁸⁵ 僅憑藉砲艦外交的展現，無須實際戰鬥，列強駐滬海軍即足以實現黃浦江的中立化。簡單來說，溫和型的砲艦外交或「列強海軍在場」對於威嚇江浙雙方，限制內戰範圍，從而確保上海租界附近區域的安全，扮演極其重要的關鍵性作用。

四、上海中立化問題

江浙大戰一旦在吳淞、黃浦江附近爆發，戰火勢必波及到航道安全，也將造成上海對外海上交通的實質封鎖。如此對於列強而言，將會產生一個難題：列強是否應該默認江浙戰爭對於上海的封鎖，或是列強應該基於安全考量，勸告外國百姓在戰爭期間避免經由海路進出上海？換言之，在江浙戰爭期間，列強究竟是否該依照條約規定，堅持長江水道的自由航行權，以維護上海對外航道的通暢。其次，如要確保上海租界及其周遭地區免於戰火蹂躪，最好的方案，莫過於將上海劃為安全區，禁止江浙雙方在此區戰鬥進行，此即為上海中立化問題。

(一) 列強駐華使領推動上海中立化

江浙衝突日趨嚴重之際，浙江方面由於深處直系包圍網之中，迫於直系強大的海陸武力威脅，乃多次私下聯繫上海外國領事團，希望由領事團出面關切江浙衝突，意欲藉由國際力量的介入以維持現狀。⁸⁶ 例如淞滬護軍

⁸⁵ Deapatch from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to Commander-in-chief, Asiatic Fleet, cited from Commander-in-chief, Asiatic Fleet to the Secretary of Navy, September 5, 1924, *RIAC*, 893.00/5599.

⁸⁶ 浙江方面的浙江督辦盧永祥、淞滬護軍使何豐林、上海外交特派員均試圖慫恿上海外國領事團出面關切戰事。美國駐滬總領事甚至認為浙江方面可能藉由誇大直系海軍武力準備進攻上海之事，來誘使上海領事團介入處理江浙糾紛。見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3, 1924, *RIAC*, 893.00/5564.

使何豐林，即透過上海外交部特派交涉員許沅，向所有外國領事尋求援助：情況日益惡化，南京的軍隊持續進逼昆山與其他地方。……今日下午我(按：何豐林)與仕紳、商人召開了一次會議，並做了完整的說明。會議的副本希望能通知各國領事，以便其知曉實際的情況。為了維護淞滬地區的秩序，我必須採取有力的措施，來保護這個區域的外國居民。⁸⁷

然而，上海外國領事團內部卻普遍相信江浙戰爭恐無法避免，因此對於是否要介入協調持保留態度。不過，為了阻止情勢進一步惡化，領事團開會討論決定仿效 1923 年 8 月之舉，再度致函江浙雙方軍事首長，要求正視戰爭的嚴重後果，以及確保上海周邊地區與海路、鐵路交通的安全。⁸⁸其次，領事團也極力斡旋試圖將上海周圍地區劃為中立區域，禁止戰鬥進行，避免上海遭到破壞。⁸⁹再者，領事團也分別通知江蘇方面的杜錫珪與浙江方面的何豐林，強調列強「無法容許在黃浦江內發生海軍戰鬥」，同時也反對交戰雙方發佈的長江封鎖令，「任何阻礙黃浦江、吳淞商業往來的企圖均不被准許」。⁹⁰

⁸⁷ 淞滬護軍使自行準備了十餘份副本，要求外交部特派交涉員許沅轉交所有駐滬外國領事，Communication from Commissioner of Defense of Sunkiang and Shanghai,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Affairs to Senior Consul, August 27, 1924, *RIAC*, 893.00/5568.

⁸⁸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5, 1924, *RIAC*, 893.00/5563.齊燮元、何豐林稍後均回覆領事團，表示會維持和平，並盡力保護外人的安全。見A Letter from Chi Hsieh Yuan, Inspecting Commissioner of Kiangsu, Anhui and Kiangsi, to American Consul-General % Senior Consul, Shanghai, August 27, 1924 & Defense Commissioner of Sunkiang and Shanghai to Senior Consul, August 27, 1924, 收入〈上海矢田總領事ヨリ幣原外務大臣宛(1924年9月5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蘇浙江開戰風說ニ對シ外交團領事團警告ノ件》，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各國態度第四卷，1-6-1/1-0981。

⁸⁹ 〈支那經濟界の動搖：事態緊迫遂に大事出來か〉，《大阪毎日新聞》(大阪)，1924年8月30日。

⁹⁰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September 5, 1924, *RIAC*, 893.00/5585.

北京外交團也開會商討因應之道，鑑於 1923 年 8 月列強的聯合警告對於制止江浙戰爭甚有作用，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James Ronald Macleay)力主仍依照去年模式，再次由列強聯合照會北京政府外交部。⁹¹1924 年 8 月 29 日，美、英、日、法四國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遞交了聯合照會，以最嚴肅的態度重申中國政府對於當前危機的責任，必須防制可能對上海地區外人生命財產造成的危害。⁹²8 月 30 日上述四國公使開會討論上海附近海域的海戰危機後，隨即聯袂拜訪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強調列強不可能漠視江浙雙方在黃浦江內戰鬥所造成的封鎖與對外人生命財產的危害，並表示列強將嚴守中立，不介入中國內戰糾紛，但也希望中國方面由外交總長發表黃浦江及其出海口為中立區域，避免戰事影響上海安全。四國公使並恫嚇謂：如果中國方面無法達到，列強將動用軍艦與兵力，自行維護黃浦江(從吳淞到上海兵工廠)的中立與安全。顧維鈞則允諾在諮詢海軍部意見後，再做答覆。此次四國公使交涉內容，著重在黃浦江禁止戰鬥、規劃中立區域(確保上海租界安全)，以及必要時動用海軍武力等三大方向，其中前兩者屬於外交訴求，後者則是武嚇手段。⁹³

⁹¹ Telegram from Sir R. Macleay (Peking), August 27, 1924, *FO*, 371/10243; 〈北京芳澤公使ヨリ幣原外務大臣宛(1924年8月28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蘇浙江開戰風說ニ對シ外交團領事團警告ノ件》，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各國態度第四卷，1-6-1/1-0981。此外，英使在8月27日即單獨與外交總長顧維鈞就江浙衝突問題進行交涉，英使並將江浙問題與提高關稅助賑兩事掛上關係，聲稱江浙衝突如危及上海安全，勢將影響外人對於提高關稅助賑的意願。見〈顧總長會晤英麻使問答(1924年8月27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07-02-016。

⁹²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9, 1924, *RIAC*, 893.00/5484; "Powers Combine in Warning to Taking," *The China Press*, 29 August 1924.

⁹³ 四國公使以英使麻克類為首，負責與顧維鈞交涉。見〈顧總長會晤英麻使、日本芳澤公使、法祁代使、美貝代使問答(1924年8月30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07-02-017；〈四國公使聯袂訪外長：對保護外僑事提出三項要求〉，《晨報》(上海)，1924年9月1日，2版；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30, 1924, *RIAC*, 893.00/5485。關於四國公使與外交總

9月3日，顧維鈞派外交部秘書黃宗法、熊垓、劉錫昌等分赴英、美、日、法四國公使館，稱中國「政府業已接洽江蘇陸海軍長官，現已得其保證，無論情形若何，該長官必不遺餘力保護外僑生命財產，並特別保護上海租界之安寧」，但並未就列強最關心的上海黃浦江中立化問題做出答覆。⁹⁴英國公使麻克類、日本使館參議太田為吉，均向來館晤談的外交部秘書再度提出「淞滬一帶劃為中立地點」的方案。麻克類則更進一步向黃宗法闡釋其規劃的中立化方案為「交戰之兩方，面對於軍事，皆不得利用該地，或者將該地完全交與第三者或租界當局暫時管理，一俟戰事告終，即行交還戰勝之方」。⁹⁵9月7日英、美、日、法、義五國駐華公使透過外交管道，向外交總長遞交了第二次的聯合照會，重申列強嚴守中立，但為維護黃浦江的安全，必要時不排除動用武力：

列強無意介入(江浙戰爭)事態的發展，但警告中國政府：雖然各國政府不會介入干涉或偏袒任何一方，但是他們不容許在黃浦江或其入口地區發生海上戰鬥，否則將採取必要措施—甚至可能是武力性質的一來防止此類戰鬥的發生。

長顧維鈞面談的實際交涉內容，外交部檔案、中文報紙報導與美國駐華公使報告均略有出入，但大方向一致。依據《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顧維鈞與各使會晤問答，公使團交涉的重點在於黃浦江(吳淞口至製造局)安全問題、「淞滬之區劃為中立之地」、「各國軍艦於不得已時，亦祇有用武力干涉」。至於北京《晨報》則將四國公使交涉內容整理為三項要求：「1.請劃出上海為中立地點，附近30哩以內，雙方不准作戰、2.吳淞口為中外輪船出入之地，應劃出戰線之外、3.有必要時，各國軍艦得自由開至長江巡弋，保護僑民。」

⁹⁴ 黃宗法赴英館與美館、熊垓赴日館、劉錫昌赴法館。見〈黃秘書宗法往晤英麻使譚話紀要(1924年9月3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07-02-018；〈熊垓赴日本使館會晤太田參議問答(1924年9月3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06；〈劉錫昌赴法館會晤嘉參贊問答(1924年9月3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09-04-009；Verbal Message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3, 1924, *RLAC*, 893.00/5584。

⁹⁵ 黃宗法答以將面陳總長報告此事。〈黃秘書宗法往晤英麻使譚話紀要(1924年9月3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07-02-018。

聯合照會並對中國政府未能宣布黃浦江中立化一事感到遺憾。⁹⁶9月1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具文照覆外交團，表示已轉知海軍部、江蘇督軍等嚴飭屬下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安全，強調在江浙內戰期間，中國政府將會盡全力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安全，但同時各國駐滬領事也應發出警告，要求各國人民絕不可以基於任何理由介入內戰事務。不過外交部照會中依然對於上海是否劃為中立區域等事隻字未提。⁹⁷

關於上海中立化問題，美國駐滬總領事克寧漢曾有相當精闢的分析與計畫。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他認為上海周圍地方劃為中立區域確不失為可行的方案：

一旦租界遭到軍事威脅，外國領事或海軍應堅持建立一個安全區域，不僅是租界，還應包括租界之外的外人產業。外國當局最好應該通知交戰雙方，此區域為中立地區，侵入此區將會遭遇外國軍隊。這應該是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唯一有效的方案。⁹⁸

克寧漢並預先規劃了美國版的上海中立區域方案：首先，軍火庫、兵工廠應從江灣、龍華與吳淞地區遷出，所留地帶交由警察管理；其次，擴大上海租界的範圍，非但可以提供中國難民足夠的保護，外人也可趁此機會將租界外的外國產業納入外人的控制之下。因此，在上海周圍成立中立區域，既可以收容中國難民，外國人也可以從此免除一再發生的內戰威脅。⁹⁹

⁹⁶ Memorandum to Dr. Koo, September 7, 1924, *RIAC*, 893.00/5584。8月30日四國公使向顧維鈞聯合施壓時，因義國公使恰巧不在北京，故未能及時參與。但第二次聯合照會前，義國公使已趕回北京，故一同署名參與聯合照會。見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8, 1924, RIAC, 893.00/5502*。

⁹⁷ 〈外交部節略(1924年9月11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蘇浙江開戰風說二對シ外交團領事團警告ノ件》，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各國態度第四卷，1-6-1/1-0981。美國公使館接獲外交部的照覆後，立即要求美國各領事館發出警告，不得介入內戰事務。美國國務院稍後也認可了公使館的行動。*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3, 1924, RIAC, 893.00/5520*;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erican Legation at Peking, September 15, 1924, RIAC, 893.00/5526*。

⁹⁸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September 5, 1924, RIAC, 893.00/5585*。

⁹⁹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簡言之，維護上海對外海上交通的通暢無礙(自由航行)以及附近區域劃歸中立區域，乃是列強駐華使領處理江浙戰爭危機時所提兩個應變方案。

此外，附帶一提，外國使領所提的上海周遭地區中立化方案，甚至也獲得部分中國商人的認同與支持。例如上海中國總商會即致函北京與江浙雙方軍政要員，呼籲將上海附近劃為中立區域。

假如不幸戰爭無法避免，最重要的是，必須劃出戰區，在上海商業中心周圍 15 哩禁止發生任何形式的戰鬥……。(如若不然)恐將引起複雜的外交問題。¹⁰⁰

顯而易見，華商為了自身商業利益起見，同聲附和外國人的上海中立化方案。

(二)北京政府的回應：「上海、吳淞部分地區中立化」方案

北京政府在 1924 年 9 月 7 日的內閣會議上，正式決定拒絕五國公使所提的上海中立化要求。¹⁰¹但在內閣會議的前一日(9 月 6 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即已派遣秘書黃宗法，與英國公使麻克類展開了秘密協商，並口述北京政府自行擬定的上海中立化方案，其目的可能希望在向公使團正式提出前，先疏通英國公使，並研究此方案的可行性。黃宗法口述的上海中立化方案為：

淞滬一帶劃為中立區域，須訂種種切要條件，各方俱應相約遵守……：

1. 消滅吳淞要塞大砲之射擊能力；
2. 停泊黃浦江之浙屬軍艦須解除武裝；
3. 停閉龍華之江南製造局；

to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September 8, 1924, *RIAC*, 893.00/5587.

¹⁰⁰ “Chamber Asks Neutral Zone near Shanghai,” *The China Press*, 4 September 1924.

¹⁰¹ 〈北京坂西中將ヨリ參謀次長宛(1924年9月9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江浙戰況第二卷，1-6-1/1-0970。此外，早在內閣會議前，北京政府即已向報界放出消息，稱公使團所提之中立區域並無條約依據，故將根據條約予以反駁。見〈使團堅持滬淞劃為中立區域：政府擬據約駁復說〉，《晨報》(上海)，1924年9月6日，3版。

- 4.解除現駐該區內軍隊之武裝或令該軍隊撤退；
- 5.禁止經由該區輸運軍隊、軍需以及子彈或裝配各項。

上述各端為實行上海中立所必須有條件之一部……若能得浙軍方面於原則上之贊同……可再交由專家擬定以便商定施行。¹⁰²

從內容上看來，北京政府版的上海中立化方案一點也不中立，等於變相要求浙江方面直接放棄淞滬地區，顯然有著直系軍事首領與海軍部運作痕跡。¹⁰³然而，英國公使麻克類非但贊同此中立化方案，甚至還主動建議浙江應在期限內從中立區域撤除武裝，逾期將由列強強制「收容」：

倘浙江於期限內將砲、軍艦暨軍隊自該區域內移出，則吾人不能過問，如逾期限而未移出者，則在戰事未止以前，將其一律收容不准再為使用，並可派外國武官監視收容之軍艦。關於江南製造局暨龍華之火藥廠，亦須與以限期，俾其停閉。¹⁰⁴

英使的態度明顯有違列強嚴守中立立場之嫌。姑且不論北京政府版中立化方案利於江蘇而不利浙江，如又依照英使所言，列強將動用武力強迫浙方從中立區域撤離，等於近乎協助江蘇方面肅清上海附近的浙軍勢力。

英使的表態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北京政府。於是在 1924 年 9 月 16 日，外交總長顧維鈞正式照會五國公使，提出北京政府版的上海中立化方案，內容大致不脫外交部與英使館秘密協商的條件，¹⁰⁵惟詳訂中立區域範圍，

¹⁰² 〈黃秘書宗法往晤英麻使問答(1924年9月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07-002-019。

¹⁰³ 外交部秘書黃宗法後來即曾對美國公使館參贊表示：「中立區域一事……須先與齊巡閱使接洽，然後再為提出具體辦法，現在齊使答覆已到……。」，而中立化的條件有兩個目的，「一、保護上海一帶安寧；二、不妨礙蘇軍之職務」。顯然中立化條件必須有利於江蘇方面的軍事進展。〈黃秘書宗法往晤美館撫參贊談話記錄(1924年9月1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13。

¹⁰⁴ 〈黃秘書宗法往晤英麻使問答(1924年9月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07-002-019。

¹⁰⁵ 依據美國公使館的報告，五國公使所收到的「上海、吳淞部分地區中立化」方案：「一是吳淞要塞必須拆除、二是浙江軍隊控制的軍火庫與火藥工廠必須關閉、三是黃浦江內的浙江軍艦與上海周圍的浙江軍隊必須解除武裝或撤退，如此北京政府將同

同時也遵照英使麻克類之建議，另外規定期限，即中立區域內之浙軍砲台、軍隊、軍艦必須在兩日內撤出或解除武裝。¹⁰⁶

然而，除了英國以外，其他各國公使館多半對於北京政府版中立化方案心存質疑。美國公使館代辦貝樂(Edward Bell)給國務院的報告中，即直言上述條件明顯有利於江蘇軍隊，而不利於浙江，列強如介入協調，不啻是替直系強逼浙江接受不平等的條件，勢將違反列強堅持的中立原則。¹⁰⁷法國公使館參贊也質疑條件中為何「中立區域(浙江)軍隊能解除武裝或撤退，何以軍艦僅能解除武裝？」¹⁰⁸如依照上述條件，浙江方面非但得讓出淞滬地區，還必須交出所屬海軍艦隻。日本使館參議亦質疑此項條件北京政府事先既未與浙方接洽，即或列強介入協調，「浙方此時未必能贊同」。¹⁰⁹因此，五國公使內，除英國原先贊同、¹¹⁰義國公使態度不明外，美、法、日等國均質疑上述條件的可行性。

英、美、日、法、義五國公使於9日17日開會討論後，正式決定拒絕為此中立化方案背書。換言之，五國公使之間，以美方為主反對介入的意見，最後顯然壓過英國原先的看法。因此，五國公使給外交部的答覆中，

意上海周圍五哩、吳淞周圍三哩劃為中立化區域。」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7, 1924, *RIAC*, 893.00/5535.

¹⁰⁶ 外交部正式照會內容中，共有四項不在當初向英使提示的條件之內：1. 中立區域範圍、2. 浙軍撤軍或解除武裝期限(9月17日至19日)、3. 中立辦法至江浙戰事結束之日止、4. 浙方如未履行條件，則視同中立未成立，中央軍隊將不受約束。見〈熊垓赴日本館會晤太田參議問答(1924年9月1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16。

¹⁰⁷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7, 1924, *RIAC*, 893.00/5535.

¹⁰⁸ 〈劉錫昌赴法館會晤嘉參贊問答(1924年9月1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09-04-009。

¹⁰⁹ 〈熊垓赴日本館會晤太田參議問答(1924年9月1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16。

¹¹⁰ 不過，英國此時態度亦有鬆動之意。英使館參贊台客滿即對黃宗法表示：中立條件期限兩天太短，依照英使原先規劃，應至少有一星期至14日，不過「現時中立區域劃與不劃，已不甚緊急，杜總司令與林建章司令雙方均已各向領團暨各國艦隊司令切實保證不在黃浦江內交戰，且蘇軍一時似不能進攻上海」。見〈黃秘書宗法往晤英館台參贊談話記錄(1924年9月1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07-03-003。

強調無法對外交部所提的中立化方案表示意見，因為「所稱實行淞滬(中立)之辦法各條件，只能歸兩造自行協商，外交團不能少置可否」，同時也提醒中國政府，無論上海中立化方案成功與否，列強堅持「絕不容在黃浦江上及其附近地方發生海戰，並保留特權設法制止上項軍事行動，及制止有妨礙吳淞口與洋面間外國航業之行動，雖用武力，亦所不恤也」。¹¹¹五國公使的照會前半部表明了列強嚴守中立的原則，不會介入軍隊派系之爭，後半部則刻意凸顯列強藉由海軍武力威嚇以達成維持上海對外交通順暢的目的。

代表五國公使負責向外交部轉達意見的義國公使翟祿第(Vittorio Cerruit)，亦對顧維鈞表示「此項條件浙軍未必甘心屢行，五國若出面作此調人，則五國中立地位恐將由破壞」。五國公使甚至未將此中立化方案電告上海領事團，擺明列強無意介入威逼浙江方面讓步。義國公使坦言根據五國公使現在的態度，「即使將來電滬……，亦不過任該領事團自行斟酌辦理，並無何等訓令」。¹¹²簡言之，五國已達成共識，即嚴守中立、決不介入江浙衝突。

然而，北京政府外交部仍不死心，持續企圖遊說英使麻克類與義國公使翟祿第。9月23日外交部秘書黃宗法攜帶〈告外交團勸解盧逆武裝以保公安之理由〉說帖一件，前往英使館交涉，強調盧永祥已眾叛親離，孫傳芳所率閩軍亦將戡定浙江全省，故希望外交團出面勸告盧永祥不要再據守淞滬地區：

外交團夙重和平……，現大軍合圍，亟待蕩平，惟外交團能勸告盧(永祥)何(豐林)及其部屬繳械遣散，俾淞滬可不戰而定，則中外人民同深欣慰。若後容其盤踞或便利其抗拒之進行，則……不得不忍痛進殲，屆時此項責任，國軍方面未能擔負。是惟外交團自擇耳。¹¹³

¹¹¹ 〈顧總長會晤義翟使問答(1924年9月17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2-01-013。

¹¹² 〈顧總長會晤義翟使問答(1924年9月17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2-01-013。

¹¹³ 〈告外交團勸解盧逆武裝以保公安之理由(1924年9月23日)〉，〈黃秘書宗法往英館會晤英麻使談話記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23。

但此時英使麻克類態度已經大為改變，一方面聲稱「顧總長曾經表示不願外國干涉」，外交團如再向盧永祥、何豐林施壓令其解除武裝，「則是干涉貴國內部之事，吾人此時殊不願作此一舉」，二方面又藉口北京政府相關報紙，如英文《北京日報》、《京報》多次抨擊外人干涉之言論，故不願重作馮婦。在場的英使館參贊台克滿(Eric Teichman)更是直接點破北京政府外交部所提外人干涉論的矛盾之處：「貴國政府係欲盧何繳械降服，倘吾人不用武力，余恐盧何未必就範。吾人若用武力，又是干涉貴國內政」。因此台克滿認為，不如北京政府先與浙江方面自行商妥停戰條件，屆時外交團再出面斡旋。但黃宗法仍鏗而不捨，退而求其次，希望外交團透過上海領事團「運用輿論力量」來對盧永祥、何豐林施壓。英使麻克類則仍堅稱此舉與列強干涉無異，建議北京政府自行委託「上海商會代為辦理」。¹¹⁴

9月24日，外交總長顧維鈞會晤義國公使翟祿第，重提希望外交團能嚴重警告盧永祥、何豐林不得利用上海負隅抵抗，但未獲翟祿第回應。¹¹⁵同日，顧維鈞親上火線，會晤英使麻克類，意欲弄清英國真正的態度。顧、麻兩人此日的對話相當露骨、交互攻訐，適足以揭露上海中立化問題的箇中虛實。

顧維鈞：英國各電報、通信社多鼓吹列強干涉中國內戰之議。

麻克類：英國政府對華政策向來與報紙言論無關，僅倚重駐華公使意見，但此時認為並非「列強干涉中國時機，應聽貴(中)國各方自行解決」。¹¹⁶

麻克類：重申23日對黃宗法所提之言論，表示英國將嚴守中立，不會介入干涉，此時自然「袖手旁觀，一聽貴國自行解決」。

顧維鈞：英使之意見「殊令人費解」，且淞滬劃為中立區本是英使提

¹¹⁴ 〈黃秘書宗法往英館會晤英麻使談話記錄(1924年9月23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23。

¹¹⁵ 顧維鈞對翟使稱：「中國政府頗希望外交團亦幫助該處(上海)商會及地方團體向盧、何嚴重警告」。〈總長會晤義翟使問答(1924年9月2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28。

¹¹⁶ 〈總長會晤英麻使問答(英國態度事)(1924年9月2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24。

議，外交部才擬定相關辦法，但最後英使及公使團卻稱「不便」介入處理。

麻克類：「貴總長所提之辦法，極端難行」，「劃定中立區之辦法，必由雙方協定成立」。

顧維鈞：盧、何現僅憑藉租界之屏障，負隅抵抗，希望英國非正式運用外僑輿論力量，自能讓盧、何棄守。

麻克類：盧何所佔之製造局、火藥局俱在租界之外。

顧維鈞：雖在租界之外，但與租界近在咫尺，莫如外人介入勸告，迫使盧、何早日卸除武裝。

麻克類：指責北京政府當初未與盧、何商議中立區域，此時列強只能劃定租界範圍以內不准作戰。至於租界之外，只能由雙方協商議訂，如雙方均願意停戰，則英國可以考慮出面調解。

顧維鈞：仍甚盼上海領事團運用外僑輿論力量，達到盧、何繳械之目的。

麻克類：此時最重要的問題在奉系張作霖的行動，北京政府應與盧何商議，「赦免既往」，「令其報誠」。

顧維鈞：盧、何只要佔領上海，即可能利用上海「甘冒不韙也」。

麻克類：盧、何對上海應不至有所圖謀，因各國海軍已派陸戰隊登陸。且租界周圍防範嚴密，任何敗兵均不致擅入租界。盧、何據守上海之目的，應該在與奉系張作霖遙相呼應，以牽制江蘇軍隊北上。

顧維鈞：江浙戰事無礙於東北討奉之役，因為另有軍隊與之對抗。

麻克類：重申如江浙雙方願意停戰，則英國可居中斡旋，但不能擔保調戰條件的履行。¹¹⁷

由上述談話可知，顧維鈞從英使主動提議上海劃為中立區域以及英系報紙輿論，認為英國有意介入處理江浙衝突問題。但英使麻克類則撇清責任，強調因北京方面未事先與浙江盧、何等人商議，自行決定中立條件，以致中立化方案破局；英國此時將堅守中立，唯有雙方自行議妥條件，英國方

¹¹⁷ 〈總長會晤英麻使問答(盧何事)(1924年9月2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25。

有可能介入調解。

如比較英使麻克類 9 月 6 日與 9 月 23、24 日的態度差異，可見英國方面已從原先不惜動用海軍武力推動上海中立化的立場，大幅退縮回不干涉內戰、嚴守中立。而英國態度的劇變，與 9 月 17 日的五國公使會議有很大的關係，特別是美國公使館代辦貝樂堅持嚴守中立的立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因素。加上此時直奉戰爭也宣告爆發，日本方面有單獨行動的可能，¹¹⁸內戰規模勢必擴大且日益複雜，此時英國不得不改持保守態度，以觀局勢變化。這也意謂北京政府假上海中立化方案之名，企圖援引列強力量介入，威逼盧永祥放棄淞滬地區的計畫，正式宣告失敗。

(三)江浙戰爭的後續發展與上海中立化問題再起

1924 年 9 月至 10 月之間的江浙戰爭，浙江在優勢兵力的直系各省聯軍圍攻下，不久即作戰失利，浙江督辦盧永祥、淞滬護軍使何豐林等人則是先逃入上海租界，繼之則在日本的協助下逃亡日本。一場諾大的江浙戰爭自此宣告落幕。但中國內戰對上海的威脅並未因此結束。因為戰鬥規模更大的直奉戰爭在山海關附近爆發，直系由於馮玉祥的倒戈回京、發動北京兵變而告落敗，大總統曹錕被囚、吳佩孚出走，直系在華北地區的勢力因此瓦解。奉系軍隊則大舉進佔華北地區，並長驅直入山東、安徽、江蘇等地區。原先逃往日本的盧永祥，在奉系張作霖的支持下，出任蘇皖宣撫使。作戰失敗的江蘇督軍齊燮元則撤往上海，並在孫傳芳的支持下，據守上海租界附近的淞滬地區，與奉系軍隊與盧永祥又呈對峙之勢，只不過此時齊燮元與盧永祥兩人互換位置。1925 年初新一波的江浙戰事又起，上海則再度面臨內戰的威脅。¹¹⁹

第二波江浙衝突對於上海租界的威脅更甚於第一次，因為雙方戰鬥的地點緊鄰法租界。齊燮元所屬直系部隊據守的上海兵工廠、龍華軍火廠緊

¹¹⁸ 〈總長會晤英麻使問答(外國干涉事)(1924年9月2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26。

¹¹⁹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525-526

鄰上海法租界，外人遭到戰火波及的風險尤大。¹²⁰1月中，列強海軍緊急派遣陸戰隊登陸協防租界安全，並將潰敗逃入租界約一萬名的直系軍隊暫時監禁在租界內學校。¹²¹在列強海軍艦隊與陸戰隊的強力警備下，第二次江浙衝突對上海租界的威脅終告化解。

歷經1924年下半年與1925年初先後兩次江浙戰爭的密集洗禮，上海各中外團體均深刻感受到內戰對租界的重大危害，更積極致力於推動上海中立化計畫。

1. 北京臨時執政府頒佈的上海中立化方案

在中外人士的呼籲與奔走下，1925年1月15日段祺瑞的北京臨時執政府正式宣告「將上海兵工廠著陸軍部即日飭令停止軍用工作，並諭上海永遠不得駐紮軍隊」。其用意乃是發生在上海附近的戰爭，各軍隊戰鬥的目標往往不在佔領商埠，而是要想控制上海兵工廠。因此如能將上海兵工廠拆遷改為商用，從根本上消除軍隊爭奪的對象，則上海自然可保無戰禍之威脅。¹²²臨時執政府此令一出，上海各界無不興奮，並擬參與上海中立區域的規劃工作。在上海總商會給臨時執政及各部會的電文，即表達上海中立區域，應以昔日上海護軍使所轄之淞滬地區為宜，且「市政之規劃，當視為中國之淞滬，不當僅為江蘇之淞滬」，籌畫過程應由官商共同參加討論：

上海為通商大埠，百凡興革均與工商業有密切關係，非由工商業領袖參加意見，不足以利推動。且本會之意，上海既劃為特別區域，當以舊設護軍使轄下範圍(為)宜，冠以淞滬二字，上海租界包括其

¹²⁰ 雙方交火的子彈甚至貫穿租界內的美國學校，也嚴重威脅到徐家匯天主堂。見 William Reynolds Braisted, *Diplomats in Blue: U.S. Naval Officers in China, 1922-1933*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9), 34-35.

¹²¹ 該批潰軍在列強海軍介入協調後，決定由外國輪船運送到山東青島。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6, 1925, *RIAC*, 893.00/5950.

¹²² 此為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長對英國公使口述之內容，見〈部長會晤英麻使問答(1925年2月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4-005。此外，1925年1月14日中午，北京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亦曾私下對美國與英國駐華公使表示「相信長江(地區)將不會再有戰鬥發生」。見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5, 1925, *RIAC*, 893.00/5947.

中，與尋常行政區域情形不同，對於籌畫組織務須就地方情形，參照現行市自治制，斟酌損益……宜由主管各部暨江蘇省長各派專員蒞滬，會同淞滬區域內之各業領袖及各派團代表聯合討論。¹²³

如依上海總商會的規劃，上海中立區域範圍將廣及整個淞滬地區且包括租界在內，並應按照自治市體制來籌設。換言之，上海總商會乃企圖規劃一個獨立於各黨派之外的淞滬自治區域。不過上海總商會的預期與實際情況有很大的落差。奉軍與孫傳芳、齊燮元等直系軍力仍一直企圖爭奪淞滬地區的控制權，1925年10月孫傳芳所部進駐上海附近，奉軍北撤。¹²⁴12月浙江軍隊又重新啟用上海兵工廠。¹²⁵中國方面推動的上海中立化方案，又化為一場空。

2. 上海外人及領事團繼續推動上海中立化方案： 軍事武力介入與否的爭議

另外一方面，受到江浙戰爭的震撼與刺激，上海外人也開始反思戰爭結束之後，該如何進一步確保上海地區的安全，以避免未來再受到內戰的威脅與波及。既然無力終止中國頻繁內戰的境況，外人只能自我強化上海的安全。其具體方法則是中國必須撤離上海附近的重要軍事據點，包括吳淞要塞、上海兵工廠與龍華火藥廠等。上海英美系報紙《大陸報》建議的方案為：拆除吳淞要塞，至於兵工廠與火藥廠，如果浙江方面贏得了戰爭，這些軍事據點就遷往杭州，反之如果江蘇贏了，則遷往南京。拆除吳淞要塞的原因，乃是黃浦江從吳淞以降，已由列強宣告為中立區域，上海也由列強海軍防護，因此原先任務設定為保護上海的吳淞要塞，自然沒有存在的必要。遷移兵工廠與軍火庫也是基於類似的理由。尤有要者：

只要列強享有治外法權與條約特權，毫無疑問的就一定會保護上海。那列強為何還容許兵工廠與軍火庫在上海租界附近運作

¹²³ 〈上海總商會電：淞滬特別區事(1925年2月7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7/011-01-021。

¹²⁴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7, 1925, *RIAC*, 893.00/6680.

¹²⁵ Report from Consul General, Shanghai, "December 1, 1925, *RIAC*, 893.00/6889.

呢？……只要外國在這裡享有特權，就應該趕走這些要塞、兵工廠與軍火庫。當外國廢棄在華特權，而中國取得上海的控制權時，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所謂的外國利益了，中國自然可以隨心所欲的建造要塞來保護上海。但是只要條約繼續有效，無論時間長短，就必須堅持撤離這些軍事據點。¹²⁶

換言之，即是將上海租界以外的周圍地區，劃為由列強武力監視的非武裝中立區域，域內中國軍隊與軍事設施一概撤離。這種主張在上海外人之間逐漸形成主流看法，尤其 1924 年底第二次直奉戰爭延伸成為第二次的江浙（齊、盧）衝突，上海短時間內連續兩度遭到內戰的威脅，上海外人社群氣憤之餘，更堅定必須建立中立區域的立場。第一次江浙戰爭期間列強駐華使領或是北京政府所提的上海中立化方案，基本上均屬於臨時性的戰時中立化，亦即中立化的期限乃隨戰爭進程而定，並非常態性設置。但第二次江浙衝突後，上海外人與報紙輿論則進一步鼓吹在上海租界周圍建立常設性的中立區域，一勞永逸解決未來中國內戰對上海租界的可能威脅。

1925 年初英國駐滬總領事應上海英商「中國協會」(China Association)之請，建議列強應派遣籌組一支國際軍事武力，除了可以阻止內戰敗兵湧入租界外，更可以在租界外圍佔領南北兩個戰略地點：北火車站以及龍華連結站。¹²⁷上海領事團也開會一致決議：列強應立即派遣一支國際軍事武力，以便在上海建立中立區域：

(內戰)嚴重威脅到外人生命財產，因此要求未來在外人居住區域周遭步槍射擊範圍以內的區域，將不准中國軍隊出現，範圍內既有的中國軍隊也必須立刻撤出。此為義、美、日、荷、英、法總領事會議的結論。應立即派遣一支國際軍事武力來確保上述要求的履行，以維外人租界的安全。¹²⁸

上海外國領事團的決議，等於變相宣示列強將動用軍事武力，在上海租界

¹²⁶ "The Future Safety of Shanghai," *The China Press*, 11 September 1924.

¹²⁷ British Acting Consul General, Shanghai to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January 16, 1925, *RIAC*, 893.00/5952.

¹²⁸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Shanghai to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January 17, 1925, *RIAC*, 893.00/5952.

外圍建立一圈緩衝的中立區域。與此同時，英系報紙《字林西報》也大力鼓吹「相關列強應在租界以外建立一個中立區域」，並「建議各國應各自派遣 1000 名士兵進駐上海保護外國租界」。¹²⁹上述情況均表明上海外人社群，無論是報紙媒體、商人團體還是領事官員等已逐漸形成共識，即確認在上海外圍建立中立區域對租界安全的必要性。其中，又以上海外商團體最主要的推動力，他們受到內戰威脅，遭受商業損失，故試圖影響報紙輿論，同時對領事團施加壓力，以塑造外人共識，進而影響列強政府的對華政策。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即認為「上海英國人及其他外商一直強力主張動用軍事武力介入中國，他們可能利用此時的情況(第二次江浙衝突)，來促使外國政府接受此方案。」¹³⁰美國公使館武官以及長江巡邏隊司令亦研判上海領事團之所以建議派遣軍事武力建立中立區域，背後可能帶有「商業利益施壓」的痕跡。¹³¹

但是，上海外人社群所推動以軍事武力護持的上海中立化方案，卻遭到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的反對。他一方面向英國公使麻克類指稱中國協會與英國總領事的建議是以「軍事武力介入中國領土的行為」，美國政府向來反對此類政策；二方面則在給美國駐滬總領事克寧漢的電報中，嚴辭質疑上海領事團的決議，並提醒事情的嚴重性，因為此舉意謂著列強在與中國「保持和平關係」的同時，卻派遣國際軍事武力「登陸並佔領中國的領土」。¹³²舒爾曼的主張，也獲得英國公使麻克類的認同，由於美、英兩國公使的反對，上海領事團試圖透過強化軍事武力推動上海中立化方案的企圖，勢將註定失敗。¹³³

1925 年 2 月上海領事團又推動新一波的上海中立化行動。如上所述，

¹²⁹ Article & Letter to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7 January 1925, cited from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29, 1925, *RIAC*, 893.00/6063.

¹³⁰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8, 1925, *RIAC*, 893.00/5952.

¹³¹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24, 1925, *RIAC*, 893.00/5963.

¹³² 舒爾曼在電報中，從國際軍事武力的定義、決策的經過、漠視列強駐滬海軍武力的作用、未與海軍官員事先協商、未事先調查中立區域內中國軍隊數量、領事團內部的各國態度等六大面向美國駐滬總領事克寧漢嚴辭質疑領事團的決議與方案。見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8, 1925, *RIAC*, 893.00/5952.

¹³³ 英國公使麻克類接受舒爾曼的看法，並將之通知英國駐滬總領事。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8, 1925, *RIAC*, 893.00/5952.

環繞在上海外國租界外有三個重要的據點：位於黃浦江口的吳淞要塞、法租界南方的上海兵工廠與龍華火藥廠。為了避免中國內戰波及上海租界以及商業區，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應中外輿論要求，在 1 月 15 日曾正式宣布上海兵工廠的非軍事化，下令將該廠移交商會使用，禁止任何中國軍隊與組織進駐。但位於黃浦江與長江交會口，影響上海對外交通咽喉的吳淞要塞卻不在非軍事化之列。吳淞要塞依然由齊燮元殘部軍隊駐守，並曾砲擊往來航行的外國商船。而黃浦江出入航運的安全，則關係到上海貿易的命脈，故為防止在未來的戰爭中，吳淞要塞的攻防戰會再度阻礙到黃浦江航運出入的安全，上海領事團請求北京外國公使聯合向臨時執政府施壓，採取適當措施，推動吳淞要塞的中立化與非軍事化：拆除吳淞要塞、撤離駐防軍隊。¹³⁴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即曾為此向北京臨時執政府外交部交涉，希望能夠廢棄吳淞要塞，劃為純商業區：

近有本國商船自長江上游駛進(黃)浦江時，吳淞砲台駐兵，似係齊氏(燮元)所部，開砲射擊本國商船……英國政府以及其他各國政府不能常忍受此類事件。上海為通商重埠，英國商務尤巨。本使以為如國廢棄吳淞要塞砲台，俾上海區域成為純粹通商民居之地，以免軍隊爭奪，誠是良謀善策。¹³⁵

然而，上海領事團的建議，再度抵觸美國歷來反對在中國動用軍事武力建立中立化的政策。因為如要強制拆除吳淞要塞、逼迫駐軍撤退，列強必須動用武力來實現吳淞要塞的中立化，這就牽涉到損害中國主權、軍事介入中國內政事務的敏感問題。早在 1924 年 9 月江浙戰爭期間，五國駐滬海軍司令即曾決議擬動用海軍武力來強制撤離吳淞要塞駐軍，改由五國共管，實現吳淞要塞的中立化，但後來遭到美國駐華公使館與國務院的反對而告取消。¹³⁶因此當 1925 年 2 月上海領事團又建議推動吳淞要塞的中立化時，美國國務院再度表達反對的意見，在給北京美國公使的訓令中，即強調「美

¹³⁴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 1925, *RIAC*, 893.00/6009.

¹³⁵ 〈部長會晤英麻使問答(1925年2月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4-005。

¹³⁶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2, 1924, *RIAC*, 893.00/5518.

國不應背離歷來的政策」，不准許美國公使推動吳淞要塞的中立化。¹³⁷回顧近代以來中美關係史，美國政府反對動用軍事武力建立中立化(*principle of military neutralization*)的政策，確實有例可循。例如 1902 年美國力主列強應將八國聯軍佔領的天津歸還中國，不應繼續以軍事武力維持天津的中立化、¹³⁸1921 年美國則堅決反對因為宜昌兵變，外商利益受損，而在宜昌推動軍事中立化與設立租界。¹³⁹

1925 年 3 月，美國國務院再度向駐華公使館表明，對於是否要動用軍事武力建立中立區域，美國的基本政策與態度是：「保護(美人)的可能程度，實際上必須限於外交的手段，以及藉由我們在中國水域海軍武力的在場」；除非發生像義和團一樣的事件，嚴重危害美人生命，否則美國政府不可能提供在華美國人民更多的保護。¹⁴⁰換言之，美國對中國內戰的因應之道，僅限於外交交涉與海軍在場(威嚇，但避免動武)，只有當中國確實發生排外暴動的情況之下，美國才可能採取更積極的措施，派遣軍事武力在中國建立中立區域。

(四)另外一個面向的上海中立化問題

前述所探討的中立化問題，基本上均屬於在上海周圍地區實際劃建中立化區域，避免上海租界再度遭受中國內戰的威脅。然而江浙戰爭的爆發，同時也刺激上海外人進一步去思考另一個面向的中立化問題，亦即如何維持上海租界本身的中立地位。這個部份比較屬於抽象的中立性，為了確保上租界的中立地位，避免捲入中國內爭，對於敏感的地方軍閥及其相關的人事物，必須慎重考慮是否應將之擋於租界之外。例如租界是否應該繼續容許作戰失敗的軍閥進入租界，因為他們可能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中國管

¹³⁷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 February 7, 1925, *RIAC*, 893.00/6009.

¹³⁸ "Mr. Wu to Mr. Hay," January 20, 1902 & "Mr. Hay to Mr. Hay," January 30, 1902, *FRUS, 1921*, p.184.

¹³⁹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China (Ruddock)," June 29, 1921, *RIAC*, 893.102 Ic/3.

¹⁴⁰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 March 30, 1925, *RIAC*, 893.00/6063.

轄權所不及)，謀求東山再起的機會。¹⁴¹其次，軍閥亦可能租界內的倉庫或樓房存放軍事物資，一旦江蘇擊敗浙江，上海租界馬上必須面臨此批物資的歸屬權交涉問題，如果同意由浙江方面繼續使用，則將遭受江蘇方面指控租界違反中立、介入內戰的指責，但如果移交給江蘇方面使用，同樣也會產生類似爭議，甚至可能法律問題，反之亦然。因此江浙戰爭也促使上海外人反思如何確保上海中立性，而具體作法則是拒絕失意軍閥進入租界，防止軍閥使用租界內的屋舍作為軍事用途等，讓上海租界真正成為一個中立城市。但此類問題牽涉到中外條約的相關規定，同樣也影響到中國主權問題，絕非租界當局本身所能解決，而有賴北京各國外交團與北京政府交涉後，以確立具體的作法。¹⁴²

江浙戰爭期間，即曾發生一件重大爭議，浙江方面的淞滬護軍使署指控中國電報局(Chinese Telegraph Administration)設在公共租界內的上海辦事處庫房中存有軍事物資，因直系軍閥控制北京中央政府，因此該庫房也就成為江蘇方面的軍火轉運中心，既不利浙江方面的戰事進展，同樣也使得外國租界當局有違反中立、介入內戰的嫌疑。特別是該局上海辦事處主任杜逢時正是江蘇方面海軍司令杜錫珪的兄弟，因此上海辦事處的動向牽涉到敏感的江浙之爭。¹⁴³為了取得該辦事處與庫房的控制權，淞滬護軍使署透過外交、司法雙重途徑來著手。首先，由上海特派交涉員照會上海領事團，為了避免電報物資充作軍事用途，要求領事團應下令租界當局，協助護軍使署在中國電報局上海辦事處中任命代理人(孫繩武)，以監視電報物資的流向：

中國電報局上海辦事處庫房應該在中國地方當局指揮之下。因為電報物資與軍事用途有關，淞滬護軍使有權力執行監視與控制。上個月已有大量的電報物資被運到南京、鎮江等地以補充江蘇與安徽兩

¹⁴¹ William Reynolds Braisted, *Diplomats in Blue: U.S. Naval Officers in China, 1922-1933*.

¹⁴² 關於上海租界的中立性，以及租界內房舍的軍事用途等爭議，可以參見 “The Neutrality of Shanghai,”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7 September 1924.

¹⁴³ Kiangsu VS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from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September 17, 1924, *RIAC*, 893.00/5641.

省的軍事需求，直接威脅到淞滬兩地的和平與秩序……。因此為了維持地方的和平與安全，應(由護軍使署)設置一個代理人職務，監視上海辦事處庫房，而依照慣例與規定，租界當局應該給予協助與合作……。必要時租界巡捕也應提供協助……。而且在沒有護軍使署的明確指令時，任何人不得動用庫房的物資。¹⁴⁴

其次，則是由代理人孫繩武委託洋律師向上海會審公廨申請扣押令，「禁止杜逢時或其下屬搬運、挪置或是處理公共租界庫房內的電報物資」。¹⁴⁵由上述外交與法律的手段，可以發現淞滬護軍使署企圖以外國租界必須維持中立地位為藉口，間接將影響力伸入上海公共租界內，以控制中國電報局上海辦事處庫房的電報物資。此案一度也造成租界當局的很大困擾，先是江蘇方面的杜逢時請求租界巡捕房的協助將浙江方面護軍使署代理人孫繩武擋於辦事處大門之外，後來則是會審公廨法官應孫繩武律師之請，對辦事處庫房發佈了禁制令，不准杜逢時搬運電報物資。最後，上海領事團還是決定不介入，而將此案定位為一般民事糾紛，由會審公廨法官自行決定。¹⁴⁶

由中國電報局上海辦事處控制權糾紛一案，可以發現江浙雙方在上海的代理人均試圖利用租界的中立地位來獲取自己最大的利益，亦即打著租界中立的口號，事實上卻利用洋人的力量與保護傘，做著不中立的勾當。面對此類事件，領事團與租界當局往往處境尷尬，只能保持消極被動的立場，因為稍有不慎即可能陷入違反中立、介入內戰的嚴重指控中。由此也可以看出處在中國派系對立與頻繁內戰的複雜環境下，列強要真正堅守所謂的中立原則或是維持上海租界的中立地位，不論主觀還是客觀條件上，均非易事。

最後，此案也引出一個國際法上的爭論，如果北京政府是列強所承認

¹⁴⁴ Communication by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Affairs, Shanghai to Consul General S. de Roasi, the Senior Consul, September 16, 1924, *RIAC*, 893.00/5641.

¹⁴⁵ Applic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ixed Court at Shanghai, China, September 16, 1924, *RIAC*, 893.00/5641.

¹⁴⁶ 會審公廨法官經過調查，認為庫房只是一般電報物資與軍事用途無關，後來解除庫房的禁制令。Kiangsu VS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from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September 17, 1924, *RIAC*, 893.00/5641.

的合法政府，那打著反抗中央政府的浙江督軍盧永祥及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列強該以何種態度看待？如果視之為叛亂團體(rebel)，那列強方面就無所謂維持中立的問題，理應支持合法的北京政府進剿叛亂勢力；但如果視之為交戰團體(belligerent)，則列強就應該依照國際法慣例，保持中立，不應介入內戰。前者自然受到北京政府與直系歡迎，但後者則勢必為反直系與南方政府所堅持。在華外人公眾對此即甚感迷惑，無不希望北京外交團能正式確立原則。¹⁴⁷然而這談何容易，此類問題絕非僅靠國際法原則原理所能釐清的，而是牽涉到列強諸國與中國各派系之間的實際互動，因此必須從列強對華政策與現實國際政治著眼。

五、江浙戰爭期間列強對華合作政策的實際運作情況

華會體系核心精神之一是列強之間彼此協調合作。麻田貞雄即認為華會體系是一種「新協調體制」，除了海軍軍備限制體系之外，還有「追求東亞相對安定的政治協調體系」。¹⁴⁸不過，華會後列強在對華事務上的彼此協調，其實並不如想像中的順遂，反而時常遭遇到挫折。例如在 1923 年臨城劫車案發生後的鐵路安全善後問題(鐵路警備案)處置上，列強間就發生極為嚴重的意見分歧。倫敦《泰晤士報》北京特派員即認為中國政府之所以敢拒絕列強的要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列強本身無法彼此協調，採取一致的強硬立場。¹⁴⁹

究其實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五大強國英、美、日、法、義，在中國問題的處置上顯然常常意見不一致，而無法達成共識。關於此時列強協調的困境，英國外交部即有相當深刻的分析：

當中國侵犯條約特權時，(北京)外交團(Diplomatic Body)總是開會討論聯合行動的必要性，但不一定都能夠達成共識。不過，這也不能歸

¹⁴⁷ “The Neutrality of Shanghai,”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7 September 1924.

¹⁴⁸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日本外交史辭典編纂委員會編，《新版日本外交史辭典》(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華盛頓體制」條，頁1098-1102；川島真，〈再論華盛頓會議體制〉，《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頁82-83。

¹⁴⁹ “The Chaos in China,” *The Times*, 6 September 1923.

答於外交團。因為要使中國屈服，第一個方式是說服，但由於中國的藉口拖延而經常毫無所獲；第二個是武力，但由於許多的原因，這似乎也不是可行或可取的方式。¹⁵⁰

除了文攻武嚇難以發揮實際效用以致協調無成外，主要關鍵原因還是列強之間各自的政策考量與利益衝突，導致協調工作難以落實。例如 1924 年 4 月，英國《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在分析中國局勢時，認為華會後列強必須彼此協調來處理中國事務，但北京外交團卻表現的「亂七八糟」，主要原因在於日本從中作梗：

從孫中山威脅收回廣州稅關的事件中，已可得知列強協調的必要性。而由於(中國)屢次違背條約、對外人生命財產的不尊重、財政困難、關稅附加稅問題等……，更加顯示出列強協調、採取一致政策的必要性。但此時北京公使團卻表現得非常亂七八糟，主要是受到日本新政策的影響：華會之後，日本為了向中國人凸顯與之前不同，刻意採取(與列強)不協調的態度……。¹⁵¹

上述有關日本政策的評論並非全為事實，但某種程度上還是清楚反映出華會之後英、日之間的不合與矛盾。

藉由分析江浙戰爭期間列強政府的態度，適足以透過真實案例揭露隱藏在協調合作政策背後，列強各自的盤算，從而檢驗華會體系在中國的實際運作情況。以下將個別分析美、英、日三國在江浙戰爭期間的基本態度。

(一) 美國的態度

美國駐南京領事戴維斯(John K. Davis)在評估江浙戰爭時，認為江蘇方面的勝利將有利於美國，同時也樂見直系的進一步壯大，因為統一的中國將有助於改善中國現況。

齊燮元的決定性勝利，將會對上海帶來極大的好處，從而免除省際

¹⁵⁰ Situation in China, Minutes of Foreign Office, April 1924. FO, 371/10243.

¹⁵¹ 除了日本之外，《曼徹斯特衛報》認為蘇俄的態度也會影響到列強協調的成敗，因為「蘇俄在遠東事務也日漸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要描繪中國的政治前景，則不能忽略蘇俄的因素。」“The Outlook in China,” *Manchester Guardian*, 4 April 1924.

戰爭的威脅……。尤有要者，一旦齊燮元履行其諾言，兵工廠將從上海遷移至其他內陸地區，原址將專供造船之用。因此，從美國利益而言，無論是商業或人道，齊燮元的勝利可能將是有利的，因為他已經展現其公正，以及致力於維持其勢力範圍內秩序的態度……。從更大的視野來說，某一派系戰勝另一派系，雖然都是基於私心而非為了偉大的原則，然而假如預期的(直系)勝利會帶來名義上的統一，這至少給中國才智之士一個機會，未來可能促成最終實質的統一。¹⁵²

雖然在立場上部份美國領事體現出較為傾向直系的一面，不過就整體而言，從美國駐華使領、海軍與國務院之間的往來電文中，還是可以清楚發現美國政府對江浙戰爭的基本態度，是以確保美人生命財產安全、維持上海對外交通為首要考量，同時嚴守中立，不偏袒江浙任何一方，也不介入戰事。上海美系英文報紙《大陸報》即清楚揭露美國政府於中國內戰的基本態度，其實就是「嚴守中立政策」(“the policy of strict neutrality”)¹⁵³

江浙戰爭前夕，美國長江巡邏隊指揮官給各艦艦長的訓令中，明白規定當有以下情況發生時，美國海軍方能動用砲艦，進行武力介入：1.江蘇海軍進攻吳淞要塞的行動，危及到附近美商公司(Commercial Cable Company)人員與財產的安全，以及流彈威脅到黃浦江內的船隻或是租界內的外人生命財產；2.江浙雙方在黃浦江內發生戰鬥；3.浙江方面的吳淞要塞開火攻擊黃浦江內的船隻。¹⁵⁴上述動武條件清楚反映出美國有限度海軍動武方針，亦即只有當江浙戰火可能直接危及到美人生命財產安全或阻礙上海對外交通(黃浦江)時才能動用武力。然而，在執行上與標準的認定上，還是可能會有所疑慮或歧見。

我們可以從美國國務院與駐華使館，針對江浙戰爭期間美國海軍任務

¹⁵² Civil War between Kiangsu and Chekiang Military Governors, from John K. Davis, American Consul, Nank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6, 1924, *RIAC*, 893.00/5635.

¹⁵³ “Just What is America Going to Do about It,” *The China Press*, 23 September 1924.

¹⁵⁴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Force to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Shanghai, September 7, 1924, *RIAC*, 893.00/5592.

與動武原則的討論中，看出端倪。依據美國國務院 9 月初給駐華使館的訓令，動用海軍武力的標準僅限於保護美人生命財產安全：

國務院認為在長江動用海軍武力，應侷限於保護美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雖然依照條約，享有長江自由航行權，但國務院並不認為情況已惡化到必須使用武力來反制長江封鎖令。

但是同時國務院又給予另一項看似矛盾的指示：「當情況緊急時，為了確保上海至公海的航行通暢，列強海軍應使用一切適當手段來達成目的」。¹⁵⁵

這兩項相互抵觸的指示，使得美國駐華使館感到無所適從。第一項指示明顯屬於消極防禦性的海軍動武方針，亦即只有當江浙內戰的軍事行動危及美人安全時，方可被動地使用海軍武力。然而，第二項指示卻是積極主動的海軍護航方針，因為江浙海軍內戰時，如要確保上海至公海的通行無礙，列強海軍勢必得採取相當激烈的軍事行動，甚至有可能與江浙海軍爆發實際衝突。職是之故，公使館又立刻向國務院請求更為明確的海軍任務與動武原則。¹⁵⁶

國務院則再次告訴駐華使館：依照美國的規定，未經國會同意，行政部門不得隨意動用海軍武力，除非是為了保護美人生命財產安全。但是由於上海的情況牽涉到列強共同的利益，要確保上海至公海的交通無礙，就需要列強之間的海軍合作：

(國務院認為)列強在黃浦江的優勢海軍武力，藉由彼此的合作，應能確保外國航運的安全，從而保護美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但卻不需要與中國武力發生實際戰鬥。¹⁵⁷

為了促使美國海軍採取同一立場，國務院也將兩次給北京公使館的訓令一併告知海軍部。¹⁵⁸

¹⁵⁵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erican Legation at Peking, September 6, 1924, *RIAC*, 893.00/5495.

¹⁵⁶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7, 1924, *RIAC*, 893.00/5498.

¹⁵⁷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erican Legation at Peking, September 8, 1924, *RIAC*, 893.00/5498.

¹⁵⁸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the Navy, September 9, 1924, *RIAC*,

上述國務院給駐華公使館的兩份訓令，某種程度上清楚體現出美國現階段對華政策的基本特質：一、除非內戰確實危及美人生命財產安全，否則絕不輕言動用武力；二、要降低內戰對外人的影響，最好的方式不是直接使用武力，而是透過列強駐華海軍之間的合作，集結優勢的海軍艦隊，展現強大的海軍武力與實質性的威嚇力量，迫使中國軍隊心生畏懼而不敢挑釁，從而確保上海對外航行交通與洋人的安全。簡單來說，就是有限度的海軍動武方針，避免與中國軍隊發生衝突，至於不足之處，則輔以列強海軍合作，以武力為後盾的外交恫嚇。

此外，美國國務院也將上述美國政策，通知美國駐英、法、日、義等國公使，命其與各國交涉，表明美國在處理江浙戰爭危機時的有限度海軍動武標準（僅用於保護美人生命財產安全），與美國嚴守中立的基本立場，同時希望各國駐滬海軍採取一致行動，以確保上海至海口的通行無礙。¹⁵⁹國務院遠東司官員也明白告訴日本駐美代辦，美國對中國事務的態度，絕非列強介入處理，而是「嚴守中立」。¹⁶⁰

然而，由於美國可能介入調停江浙、直奉衝突的傳聞依然甚囂塵上，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疑慮，美國國務院於 9 月底再次電訓駐華公使館，強調只要中國內戰未威脅到美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則美國不應介入。¹⁶¹簡言之，美國中國內戰的立場是相當明確的，那就是嚴守中立，不介入協調。¹⁶²

893.00/5498.

¹⁵⁹ 美國國務院原本僅將訓令通知駐日公使館，但在遠東司官員的建議下，一併發給了駐日、英、法、義等四國美國公使館。Secretary of State to American Embassy at Tokyo, September 10, 1924, *RIAC*, 893.00/5506.

¹⁶⁰ Conversation with Mr. Yoshida, Japanese Charge'd Affairs: Current Newspapers Reports that Views Were Being Exchanged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Question of A Plan for Settling the Present Trouble in China, September 9, 1924, *RIAC*, 893.00/5548.

¹⁶¹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erican Legation at Peking, September 30, 1924, *RIAC*, 893.00/5575.

¹⁶² 不過有一點必須提出的是，雖然從美國國務院、駐華使領與海軍的往來電文中，可以清楚看出美國嚴守中立的基本立場，但是對於駐華的第一線領事與海軍官員來說，他們個人態度與情感上可能還是比較偏向直系。例如9月初，肇因於溝通聯繫上

(二) 英國的態度

英國政府對於江浙戰爭的態度，基本上乃是不主動介入，亦不干涉中國內戰發展。早在 1924 年 1 月給英國外交部的報告中，駐華公使麻克類 (James Ronald Macleay) 即曾表明：雖然中國內部的動盪會持續好幾年的時間，但現實情況下列強不可能動用武力去干涉中國內政，所以只能在盡量確保條約利益的前提下，靜待中國的演變。¹⁶³英國外交部給英商的信件中，亦強調：除非中國軍閥內戰造成嚴重的影響，否則「列強不會介入和談，也不會考慮其他形式的干涉」。¹⁶⁴其次，江浙衝突日趨白熱化後，英國外交部次官在下議院備詢時則表示，英國政府會透過「海軍合作」來確保英國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這包括由國際海軍陸戰隊與義勇隊、警察共同保護上海公共租界的安全。¹⁶⁵綜合上述文件，可知江浙戰爭期間英國對華事務的立場乃是嚴守中立，不介入內戰發展，僅藉由列強駐華武力之間的協調

的誤會，美國駐南京領事與海軍鴿子號 (USS *Pigeon*) 艦長誤以為上海領事團將偏袒浙江，並介入阻止江蘇方面對上海的軍事進攻時，不禁替江蘇發聲：「美國領事與鴿子號艦長認為立場偏向浙江是不明智的，因為杜錫珪司令與齊燮元將軍對外人態度真摯友善，特別是美國。所以最好不要去限制杜錫珪在黃浦江的海軍行動。」鴿子號艦長甚至認為四國公使要求江浙雙方不得在上海及其附近發生戰鬥的要求，因語意不清，未定義「上海及其附近」的範圍，似乎隱含有強迫江蘇軍隊撤退的意涵。為此，美國上海總領事還致函長江巡邏隊司令，澄清美國對於江浙雙方的要求是一樣的，並未特別限制江蘇方面的軍事行動。見 Dispatch from Commanding Officer of USS *Pigeon* to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Force, cited from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Force to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Shanghai, September 7, 1924;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Shanghai to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Force, September 7, 1924, *RIAC*, 893.00/5592.

¹⁶³ Sir R. Macleay to the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 January 8, 1924, *FO*, 371/10243.

¹⁶⁴ Trade Outlook, Memorandum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 October 7, 1924, The National Archives, *The Cabinet Paper, 1915-1978*, CAB/24/168.

¹⁶⁵ 此為英國外交部次官 (Mr. Ponsoby) 1924 年 10 月 8 日接受國會議員 (Mr. Morse) 質詢時的答覆。見 Oral Answers, October 8, 1924, His Stationery Majesty's Office (Great Britain), *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Commons* (London: His Stationery Majesty's Office), 5th series, Vol. 177, 565-566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177 H.C. Deb.)

合作，來保衛上海租界安全。換言之，亦即藉由海軍合作來應變，但不主動介入或干涉內戰。

但是此種嚴守中立政策的背後，可能隱藏著英國的私心與企圖。因為本質上，江浙戰爭其實是直系軍閥所發動的武力統一戰爭序曲。而英國的嚴守中立，說穿了，不過以中立為名，實則漠視直系軍閥圍攻浙江一省。江浙戰爭爆發前夕，從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給外交部的電文中，即可略窺英國對江浙戰爭的真正態度。麻克類先是與上海總領事商討是否要採取行動，以減低戰爭對黃浦江與上海租界的威脅，但是又擔心英國的直接介入制止戰爭，會被理解為英國支持浙江方面繼續控制吳淞要塞與上海兵工廠，從而與吳佩孚和北京政府作對的情況。其次，麻克類又提出如直系控制浙江與上海對外國是否有利的問題：

儘管戰爭的爆發，可能造成貿易的不便與騷動，但是仍可思考一下：如果直系有很好的機會將其敵人從上海與浙江趕走，並收歸中央政府的管轄，那長期而言，對於外國利益或是中國整體來說，是否會有利？¹⁶⁶

此份報告可以看出麻克類不願得罪直系，甚至希望直系能在江浙戰爭中勝利的立場。英國外交部內部也評估上海兵工廠雖位於外國租界的附近，但是就算發生戰爭，「對外國居民而言，除了不方便之外，應該不會有其他的損失」；況且直系艦隊要轟擊上海兵工廠，還須先解決黃浦江內的浙江艦隊。¹⁶⁷言下之意，江浙戰爭對外人影響不大，似可放手讓江蘇(直系)海軍去解決浙江海軍、佔領兵工廠。由此觀之，英國態度很明顯地比較傾向江蘇與直系，尤其是當評估放任江浙戰事的發展與結果，有可能帶給英國更大的利益之時，英國似乎寧願冒著上海外國租界受到戰火波及、忍受不便的風險，無視江蘇海軍在黃浦江內與浙江海軍戰鬥，甚至砲轟上海兵工廠。

從以上論證，可以得知英國原先在江浙戰爭的立場是：以不干涉為名，行干涉之實，默默協助直系收回上海，其立場的偏頗可見一斑。無怪乎在日本政府內部資料中，即提及雖然列強對於江浙戰爭的態度一致，只要求

¹⁶⁶ Telegram from Sir R. Macleay (Peking), August 28, 1924, FO, 371/10243

¹⁶⁷ Hostilities in Kiangsu and Chekiang, August 28, 1924, FO, 371/10243.

保證在華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並嚴守中立，採取不干涉主義，但還是有風聞說直系背後有英、美等國的秘密支持。¹⁶⁸不過，真正支持直系的是英國，美國並不在其列。

最後，英國疑似介入中國內戰的行為，也成為布爾什維克宣傳的素材，藉此挑撥日本與英、美之間的緊張關係。蘇聯官方報紙(*Izvestia*)即指控英、美兩國秘密大力支持直系，以不干涉的方式，遂行干涉之實，「除了以保護外國人為由，派遣少數水兵外，盡量不公開派部隊登陸……以便吳佩孚能做好準備對抗張作霖」。根據蘇聯報紙的論調，如果直系在未來的直奉戰爭中獲得勝利，那將會是「吳佩孚、麥克唐納(James Ramsay MacDonald，英國首相)與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美國國務卿)三個人的勝利」，屆時日本將會在中國遭到孤立、失去影響力，所以日本必須介入支持張作霖，同時與蘇維埃同一陣線對付英、美兩國。英國倫敦《泰晤士報》研判蘇聯宣傳的目的，在於使日本對英、美產生戒心，從而介入直奉戰爭，支持張作霖的作戰。¹⁶⁹蘇俄的宣傳攻勢以及日本的疑慮，某種程度上也促使英國在處理江浙問題轉趨謹慎與保守，對外聲稱將嚴守中立。¹⁷⁰

(三) 日本的態度

雖然在段祺瑞執政時期，日本與皖系關係密切，由當時的西原借款、中日軍事協定等均可見端倪。江浙戰爭期間，部份中國報紙亦指稱日本報

¹⁶⁸ 理財局國庫課編，〈支那ノ動亂 第一報(1924年9月25日)〉，江浙戰ヨリ延テ直隸反直兩派ノ爭亂〉，國立公文書館藏，《昭和財政史資料》，第3號第70冊，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A08072194800。此外，日本駐英國大使館亦引據倫敦《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一篇名為「中國的混沌狀態」報導，指稱英國報紙鼓吹對華干涉論：中國的動盪不安已危及到與英國利益最息息相關的上海，英國應改變原先袖手旁觀的態度，進而介入干涉中國內戰事務。〈在倫敦林大使ヨリ幣原外務大臣(1924年9月6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各國新聞論調，1-6-1/1-0978。

¹⁶⁹ “Soviet Intrigue in China; Attempt to Involve Japan,” *The Times*, 6 October 1924.

¹⁷⁰ 〈總長會晤英麻使問答(盧何事、外國干涉事)〉，1924年9月2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25、019-01-026。

界鼓吹列強應對華進行干涉。¹⁷¹不過，由日本駐華使領與外務省的內部往來電文看來，日本基本上沒有積極介入處理江浙戰爭，亦未協助浙江督辦盧永祥(屬於皖系一支)抵禦江蘇方面的軍事進攻，而是與列強採取一致的立場：嚴守中立，採取不干涉路線。¹⁷²日本公使館參議太田為吉即曾對來訪的北京政府外交部秘書熊垓抱怨，盧永祥雖雇用日本退役軍人協助訓練軍隊，但與日本政府並無關係：

(受雇日本軍人)既不能參預機密，更不能計畫作戰，乃齊使(燮元)因某少佐仍在盧(永祥)處，遂宣言日本助盧作戰。日本近年以來堅持不干涉中國主義，對於局部戰爭，向持不偏不黨之態度，此固人所共知。今齊使故以惡名加諸日本，實有不合，想日本政府聞之，必極不快。¹⁷³

另外，在上海領事團會議中，日本領事雖曾主動表態力主由領事團致函江浙雙方軍事首長關切戰事，但其考量點是因為領事團的出面有助於穩定上海股票市場與商業活動，似未帶有政治目的。¹⁷⁴而且從往來電文看來，江浙戰爭期間日本方面比較重視的，並非日本本身如何介入處理，而在於英、

¹⁷¹ 《晨報》引述《東京讀賣新聞》一則評論，稱江浙戰事已使中國作為獨立國家的信用破產，列強可能停止對華財政援助，進而推動廢督裁兵運動，且必要時將動用各國長江警備艦隊維護外僑的安寧與秩序。見〈東報鼓吹列強干涉我國：江浙問題引起之惡影響〉，《晨報》(上海)，1924年9月4日，3版。

¹⁷² 日本駐華使領給外務省的報告，多半只是客觀敘述江浙戰事的來由，以及即時回報事態發展，並未提及日本如何與江浙雙方接觸以從中獲取利益。相關電文甚多，可以參見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江浙戰況第一卷至第四卷，1-6-1/1-0970；各國態度第四卷，1-6-1/1-0981。

¹⁷³ 盧永祥除雇用1名日本退役少佐外，吳淞方面據傳也固有退役日人2-3人，但太田堅稱「所雇者悉係業已脫離軍籍，編入預備之人，並非現役軍人」。見〈熊垓赴日本使館晤會太田參議問答(1924年9月3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06。

¹⁷⁴ 〈上海矢田總領事ヨリ幣原外務大臣宛(1924年8月23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蘇浙江開戰風說二對シ外交團領事團警告ノ件》，《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各國態度第四卷，1-6-1/1-0981；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5, 1924, RIAC, 893.00/5563.

美等國是否採取相同立場，嚴守中立。例如當日本駐美代辦從報紙上看到英、美擬計畫共同介入處理中國目前困境的報導時，立即晤國務院遠東司官員確認報導真實性。¹⁷⁵上海英文《大陸報》曾引述日本報紙《國民新聞》的評論，稱日本政府「在堅持不干涉政策的同時，也要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防止其他列強的介入」。¹⁷⁶此評論實乃切中日本政府對江浙戰爭的基本態度。

至於日本駐滬海軍的作為，也是僅止於與列強海軍協調，一同派遣陸戰隊登陸防衛上海租界，並未與江蘇或浙江方面有任何實際接觸或衝突。¹⁷⁷從電文中看來，日本海軍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對江浙雙方並無偏見，似乎反倒相當在意各國駐滬海軍實力比例問題，為與英、美抗衡，還曾要求海軍部增援船艦或陸戰隊。¹⁷⁸其次，日本軍方介入江浙戰爭的時間點，並非在戰爭期間，而是在戰爭結束之後：1924年10月初，當江浙大戰勝負已分、浙軍作戰失利時，盧永祥、何豐林等人在日本顧問協助之下，乘坐日籍輪船上海丸前往日本避難。¹⁷⁹當美國駐日使館參議柯飛律(Jefferson

¹⁷⁵ 美國遠東司官員則告訴日本代辦，該報導毫無根據，美國將嚴守中立。Conversation with Mr. Yoshida, Japanese Charge'd Affairs: Current Newspapers Reports that Views Were Being Exchanged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Question of A Plan for Settling the Present Trouble in China, September 9, 1924, *RIAC*, 893.00/5548.

¹⁷⁶ "Just What is America Going to Do about It," *The China Press*, 23 September 1924.

¹⁷⁷ 〈在上海武官ヨリ軍令部次長宛(1924年9月9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江浙戰況第二卷，1-6-1/1-0970；〈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ヨリ海軍次官、軍令部次長宛(1924年9月9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江浙戰況第二卷，1-6-1/1-0970；〈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 其一至其十五(1924年8月29日至10月15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131騷亂止，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000、C08051300100、C08051300200。

¹⁷⁸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江浙問題に関する件(1)、(2)〉，《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卷130騷亂，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297100、C08051297200。

¹⁷⁹ 電文中提及盧永祥的顧問為日本陸軍江副預備少佐。見〈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ヨリ海軍次官、軍令部次長宛(1924年10月13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江浙戰況第四卷，1-6-1/1-0970；〈在上海武官ヨリ軍令部次長宛(1924

Caffery)向日本政府探詢此事時，外務省的答覆為：

外務省官員非正式表示，希望國外不要利用日本當局默許盧永祥從上海來日一事多做文章，因為往來中日兩國並不需要護照，因此日本駐滬總領事並不知曉盧永祥來日之事，直到輪船啟航後才獲悉。日本政府已經通知盧永祥，只要他在日本境內不涉入陰謀，將准許其入境。¹⁸⁰

外務省官員雖以護照問題為藉詞否認介入此事，不過從事前的「默許」到事後的「准許入境」，不難看出盧永祥出逃日本之事應已事先獲得日本政府的同意。然而，因為日本是在江浙戰爭大勢底定之後，才介入善後、協助收容出逃皖系軍閥，並不能視為有干涉內戰的企圖。相較於在江浙戰爭保持協調、中立立場，日本對於華北地區直奉戰爭則表現出準備介入的態勢，並假借部隊換防之名，增兵天津，¹⁸¹而且「依據東京方面的電報顯示，日本內部正在為是否要直接介入直奉戰爭而爭論不休。一旦吳佩孚擊敗張作霖入侵滿州，日本可能公然進行干涉。」¹⁸²

年10月13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江浙戰況第四卷，1-6-1/1-0970；〈岡村中佐ヨリ參謀總長宛(1924年10月13日、14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江浙戰況第四卷，1-6-1/1-0970。日本協助盧永祥逃亡一事，亦被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所探悉，在總領事館1924年10月13日給華府國務院的報告中，即強調「實際確定盧永祥與何豐林在今早4、5點間登上海丸，該船已在8點半出航前往長崎」。見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October 13, 1924, *RIAC*, 893.00/5612.

¹⁸⁰ 美國駐日使館參議柯飛律給國務院的報告中，誤將從上海出逃的「盧」將軍，打錯為「吳」。Jefferson Caffery, Tokyo to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October 15, 1924, *RIAC*, 893.00/5618.

¹⁸¹ 根據美國天津駐軍幕僚長巴恩斯(J. F. Barnes, Chief of Staff, US Army Force)的調查，直奉衝突前夕，日本以換防為名，調派三個連的兵力(約450-500人)增援天津。美國駐天津總領事高斯(C. E. Gauss)則評論道：每當中國發生危機時，日本就常以換防為名增派兵力，先前在滿州就發生過類似的情況。見Additional Japanese Troops at Tientsin, from C.E. Gauss, American Consul-General, Tients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4, 1924; Arrival of Additional Japanese Troops, from C.E. Gauss, American Consul-General, Tientsin to Edward Bell, American Charge'd Affaires, Peking, September 12 & 14, 1924, *RIAC*, 893.00/5621.

¹⁸² C.E. Gauss, American Consul-General, Tientsin to Edward Bell, American Charge'd Affaires, Peking, September 16, 1924, *RIAC*, 893.00/5627.關於第二次直奉戰爭日本的

簡言之，日本在江浙戰爭期間，很明顯採取協調外交的立場，與英、美等國彼此協調(並保持均勢)，嚴守中立，不干涉戰事發展，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受到華盛頓會議的影響，日本避免再背上利用中國現狀、干涉中國內政的指責，二方面日本更為重視滿州利益與北方直奉之爭，加上顧慮到上海及長江流域為英美勢力範圍，故日本選擇低調以對，小心謹慎地處理江浙衝突。

總結來說，江浙戰爭期間公使、領事的聯合施壓、列強海軍合作，均可視為華盛頓會議體制下列強合作政策的再度展現。不過，以美、英、日等國為首的列強在江浙戰爭中雖然採取一致行動，宣稱不動用武力介入中國內戰事務，嚴守中立立場；然而，如深入分析箇中利害關係，各國在態度上還是有所差異。就美國來說，基本上恪遵華會決議案，嚴守中立，也避免動用武力介入中國內戰，並透過協調的機制，希望其他列強也能採取相同立場。¹⁸³就英國來說，其與直系的关系向來密切，直系的武力統一中國政策如能成功，順利建立一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對英國而言當然利多於弊。因此，儘管江浙戰場毗鄰攸關英國在華利益甚鉅的上海與長江下游地區，但英國仍選擇低調以對、不介入處理，坐視挾有優勢兵力的直系以武力圍攻浙江。蘇聯報紙指控英國藉由不干涉的手段來達到干涉的目的確實有幾分道理。至於日本，則比較注意的是北方的滿州問題與直奉對決，基本上與江浙戰爭牽涉不深，所以海軍行動的目的在於保護僑民利益，以及和英、美之間維持既協調又抗衡的關係。由此上述情況可知，雖然在對華事務上華會體系標榜列強應彼此協調合作，但是英、日實際上卻各有打算，故只能看到一種貌合神離，即外在合作內部競爭的互動關係。¹⁸⁴

武力干涉企圖，亦可參見白井勝美，陳鵬仁譯，《中日關係史(1912-1926)》(臺北：水牛出版社，1990)，頁365-384。

¹⁸³ 呂芳上認為華盛頓會議決定列強在遠東事務上將採「協調主義」，對中國事務則是「又競爭又聯合」，諸如北京外交團、國際銀行團都是協調政策的工具。見呂芳上，〈北伐時期英國增兵上海與對華外交的演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7期(臺北，1997.06)，頁187-229。

¹⁸⁴ 研究美國歷來對華外交政策的學者Tyler Dennett即認為華盛頓會議體制下的合作政策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美國以外的其他列強往往「濫用合作的權力來圖謀各自目的」。不過即使如此，由於列強都要在中國繼續發展，因此除非兵戎相見，否則他們無論彼此是否信任、是否各懷鬼胎，美、英、法、日等列強還是會維持某種程

六、結語

由江浙戰爭期間列強海軍武嚇行動的運作情況與決策經過，可以發現看似強勢的砲艦外交，受到華會體系影響與美國的主導下，其實隱含著避免使用武力介入中國內政事務的大前提。由此也可看出當時美國對華砲艦外交的意涵：一種「海軍在場」的溫和型砲艦外交模式，不戰而屈人之兵；動用海軍不在於以武力干涉中國內政，而是透過列強海軍合作，以海軍武力為恫嚇手段，來達到確保外人在華利益的最終目的。

其次，江浙戰爭中，列強為保護上海安全所採取的措施，如設置中立區域以及禁止在黃浦江內戰鬥等，一方面固然反映出作為國際重要商貿都市的上海，對外人在華利益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也凸顯出列強視上海(及其附近區域)為禁臠的心態。列強如果只是為了維持條約規定所享有通商航行權，而動用海軍武力來維持黃浦江與上海至海口的通暢無礙，尚可說依約有據。因為列強在中國內河享有的自由航行權，無論是商船或是軍艦，均載之於條約。¹⁸⁵但如使用海軍武力來強制推行關係上海租界安全至鉅的黃浦江中立化問題，則將有逾越條約規定之嫌。列強駐華公使與海軍當局所提的上海附近劃為中立區方案，如仔細考諸條約，嚴格說來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依照晚清以來簽署的中外條約，均無中立化相關的規定。其實，

度的合作。見“A Cooperative or Isolation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 August 1925. 按：Tyler Dennett曾著有*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3)一書，深入探討19世紀美國對華政策。

¹⁸⁵ 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第10款規定，「長江一帶各口，英商船隻俱可通商」；第52款則稱「英國師船，別無他意，或因捕盜駛入中國，無論何口，一切買取食物、甜水，修理船隻，地方官妥為照料。船上水師各官與中國官員平行相待」。1898年〈華洋輪船赴中國內港章程〉，第1條也清楚規定華洋輪船可任便往來專做「內港貿易」。而「內港」的定義，依照1876年的〈中英煙台條約〉，為「沿海、沿江、沿河及陸路各處不通商口岸皆屬內地」。換言之，長江沿岸各處，均可任便華洋輪船往來。〈中英天津條約〉(1858年)、〈中英煙台條約〉(1876年)、〈華洋輪船駛赴中國內港章程〉(1898年)，收錄在黃月波等編，《中外條約彙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6、14-16、494。

上海、黃浦江地區的中立化，似也無庸牽扯到條約規定。因為上海的特殊位置與交通特性，使得列強可以輕而易舉地集結數量驚人、擁有強大戰力的軍艦。江浙衝突之際，列強駐防在上海的 20 餘艘軍艦，就是實力的保證。外國軍艦只要停泊在上海，或是往來巡邏於黃浦江、長江出海口附近，就足以構成極其強大的海軍威嚇力量。例如美國國務院遠東司給國務卿的內部評估報告，即直言上海地區中立化問題雖然與條約不符，但是上海對外水道的特殊性以及列強駐紮上海的 22 艘軍艦，將足以確保上海周遭地區不會爆發軍事衝突，外人生命財產安全也可以獲得確保。¹⁸⁶所以，列強海軍根本無須實際動武壓制江浙雙方海軍，即可迫使雙方不敢在毗鄰上海租界的黃浦江附近開火。此外，在上述上海中立化問題的交涉過程中，也可以清楚發現英國與北京政府之間不尋常的關係。一方面英使麻克類傾向贊同北京政府版的中立化方案，甚至主張由列強強制收容中立區域內浙軍武力。二方面由英國長江巡邏隊司令安德森擔任總指揮官的五國駐滬海軍，提出吳淞要塞中立化主張，企圖動用武力強制撤離吳淞要塞的浙軍，俾便列強兵力進駐懸掛國旗。此類主張雖然能夠維護上海租界的安全，但實際上卻等於列強動用海軍武力協助江蘇方面進攻浙江控制的淞滬地區，嚴重違背列強不介入內戰、保持中立的原則，也因此遭到美國駐華使館與國務院的反對。

最後，從江浙戰爭期間美、英、日三國的態度，可以清楚看到列強彼此之間各自的盤算。自華盛頓會議以降，美國在列強對華事務上有著較為重要的主導權。美國政府也最堅持華會體系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原則，嚴格限制海軍動武的時機，同時藉由列強之間的彼此協調合作，將美國的態度充分告知其他國家，希望採取一致立場。因此，江浙戰爭期間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無疑再現華會體系的精髓：一方面重申美國不介入中國內戰、尊重中國主權的立場，二方面並試圖將美國的對華政策，藉由列強間協調合作的途徑，進一步擴大為各國共識。但是英國、日本則另有考量。英國表面上不願得罪美國，凡事與美國協調採取一致步驟，嚴守中立，也尊重

¹⁸⁶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9, 1924, *RIAC*, 893.00/5547.

美國主張的有限度海軍動武方針，然而實際的著眼點，不在於恪遵華會決議案，¹⁸⁷而在於嚴守中立與不干涉方針有助於英國在華利益進一步擴大。究其實際，英國只希望在不與美國衝突的前提下，繼續維持英國在華利益。至於日本，受到華會體制的影響，為避免引起美國猜忌，在對華事務上盡量採取協調外交的路線。因此日本在江浙戰爭的態度多以英美為馬首是瞻。不過，這只限於與日本利益關係不大的情況下，當第二次直奉戰爭在中國北方展開後，日本態度明顯有很大的轉變，所幸後來直系因北京兵變落敗，不影響日本在滿州利益，故日本並未積極介入中國內戰事務。¹⁸⁸由此觀之，華會體制中確立的列強協調精神，雖然在美國的力挺以及英日的顧慮美國態度下，尚稱能夠維持一種表面上的合作形式，然而如進一步分析箇中利害關係，實際上仍是各唱各的調。

¹⁸⁷ 英國學者 Ian Nish 即認為從英國角度來說，無所謂華會體系的存在，實乃一語中的。見唐啟華，〈一九二〇年代中國外交的重估(1919-1931)〉，《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頁36。

¹⁸⁸ 關於華盛頓會議後日本在協調外交與自主外交路線之間的掙扎，以及江浙戰爭、第二次直奉戰爭不干涉政策的決策經過，可以參見白井勝美，《中國をめぐる近代日本の外交》(陳鵬仁譯，《近代日本外交與中國》(臺北：水牛出版社，1989)，頁19-101)。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各國檔案

1. Additional Japanese Troops at Tientsin, from C.E. Gauss, American Consul-General, Tients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4, 1924, *RIAC*, 893.00/5621.
2. Arrival of Additional Japanese Troops, from C.E. Gauss, American Consul-General, Tientsin to Edward Bell, American Charge'd Affaires, Peking, September 12 & 14, 1924, *RIAC*, 893.00/5621.
3.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Shanghai to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January 17, 1925, *RIAC*, 893.00/5952.
4. American Legation at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3, 1924, *RIAC*, 593.00/5492.
5.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6, 1925, *RIAC*, 893.00/5950.
6. Applic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ixed Court at Shanghai, China, September 16, 1924, *RIAC*, 893.00/5641.
7. Article & Letter to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anuary 17, 1925, cited from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29, 1925, *RIAC*, 893.00/6063.
8. British Acting Consul General, Shanghai to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January 16, 1925, *RIAC*, 893.00/5952.
9. British Consul-General to American Consul-General, Shanghai, September 7, 1924, *RIAC*, 893.00/5592.
10. C.E. Gauss, American Consul-General, Tientsin to Edward Bell, American Charge'd Affaires, Peking, September 16, 1924, *RIAC*, 893.00/5627.
11.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s, September 11, 1924, *RIAC*, 893.00/5545.
12. Charles B. McVay,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Force to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September 16, 1924, *RIAC*, 893.00/5640.
13. Civil War Affects Shanghai Trade, from Consul-General, Shanghai to the

-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Legation, Peking, September 8, 1924, *RIAC*, 893.00/5599.
14. Civil War between Kiangsu and Chekiang Military Governors, from John K. Davis, American Consul, Nank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6, 1924, *RIAC*, 893.00/5635.
 15.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Force to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Shanghai, September 7, 1924, *RIAC*, 893.00/5592.
 16. Commander-in-Chief, Asiatic Fleet to Naval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7, 1923, *RIAC*, 893.00/5599.
 17. Commander-in-Chief, Asiatic Fleet to Naval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2, 1924; Acting Secretary of the Navy to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7, 1924, *RIAC*, 893.00/5536.
 18. Commander-in-Chief, Asiatic Fleet to the Secretary of Navy, September 6, 1924, *RIAC*, 893.00/5599.
 19. Communication by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Affairs, Shanghai to Consul General S. de Roasi, the Senior Consul, September 16, 1924, *RIAC*, 893.00/5641.
 20. Communication from Commissioner of Defense of Sungkiang and Shanghai,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Affairs to Senior Consul, August 27, 1924, *RIAC*, 893.00/5568.
 21.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er of Defense of Sunkiing and Shanghai, cited from Letter from the Superintendent of Customs, August 27, 1924, *RIAC*, 593.00/5585.
 22.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September 3, 1924, *RIAC*, 893.00/5489.
 23.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September 9, 1924, *RIAC*, 893.00/5504.
 24.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October 13, 1924, *RIAC*, 893.00/5612.
 25. Conversation with Mr. Yoshida, Japanese Charge'd Affairs: Current Newspapers Reports that Views Were Being Exchanged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Question of A Plan for Settling the Present Trouble in China, September 9, 1924, *RIAC*, 893.00/5548.
 26. Dispatch from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to Commander-in-chief, Asiatic Fleet, cited from Commander-in-chief, Asiatic Fleet to the Secretary of Navy, September 5, 1924, *RIAC*, 893.00/5599.
 27. Dispatch from Commanding Officer of USS Pigeon to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 Force, cited from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Force to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Shanghai, September 7, 1924;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Shanghai to Commander Yangtze Patrol Force, September 7, 1924, *RIAC*, 893.00/5592.
28.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9, 1924, *RIAC*, 893.00/5547.
 29. Employment of Force in the Whampoo, a telegram communicated by the Italian Consul-General and Senior Consul to the Consul-General for America, France, Japan and Great Britain, September 16, 1924, *RIAC*, 893.00/5640.
 30. Jefferson Caffery, Tokyo to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October 15, 1924, *RIAC*, 893.00/5618.
 31.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Cunningham), Shanghai to Charge'd Affairs(Bell), Peking, August 28, 1924, *RIAC*, 893.00/5569;
 32.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Charge'd Affairs(Bell), Peking, September 5, 1924, *RIAC*, 893.00/5585.
 33.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1, 1924, *RIAC*, 893.00/5594.
 34.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September 8, 1924, *RIAC*, 893.00/5587.
 35.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September 3, 1924, *RIAC*, 893.00/5561.
 36.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8, 1924, *RIAC*, 893.00/5590.
 37.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3, 1924, *RIAC*, 893.00/5564.
 38.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5, 1924, *RIAC*, 893.00/5563.
 39. Kiangsu V.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State of Emergency Declared in Settlement of Shanghai, Consul-General(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0, 1924, *RIAC*, 893.00/5588.
 40. Kiangsu VS Chekiang Rumored War Activities, from Consul-General, Cunningham, Shanghai to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September 17, 1924, *RIAC*, 893.00/5641.
 41. Letter from Senior Consul to the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5, 1924, *RIAC*, 893.00/5592.

42. Letter from the Commissioner of Defense of Sunkiang and Shanghai, cited from Letter from Special Envoy for Foreign Affairs to American Consul-General and Senior Consul, Shanghai, September 2, 1924, *RIAC*, 593.00/5585.
43. Memorandum to Dr. Koo, September 7, 1924, *RIAC*, 893.00/5584。
44. Notes by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1, 1924, *RIAC*, 893.00/5600;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erican Legation at Peking" September 13, 1924, *RIAC*, 893.00/5518.
45. Order from Rear Admiral Anderson to the Japanese Rear Admiral, the United States Admiral, United States Consul General, British Consul General, Japanese Consul General, French Consul General, for Information, September 1 & 4, 1924, *RIAC*, 893.00/5588.
46. Paraphrase of Telegram, American Consular-General, Shanghai to American Consul Nanking via U.S. Naval Radio, September 10, 1924, *RIAC*, 893.00/5592.
47. Report from Consul General, Shanghai, December 1, 1925, *RIAC*, 893.00/6889.
48.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erican Embassy at Tokyo, September 10, 1924, *RIAC*, 893.00/5506.
49.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erican Legation at Peking, September 30, 1924, *RIAC*, 893.00/5575.
50.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erican Legation at Peking, September 6, 1924, *RIAC*, 893.00/5495.
51.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erican Legation at Peking, September 8, 1924, *RIAC*, 893.00/5498.
52.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erican Legation at Peking, September 15, 1924, *RIAC*, 893.00/5526.
53.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the Navy, September 13, 1924, *RIAC*, 893.00/5518.
54.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the Navy, September 9, 1924, *RIAC*, 893.00/5498.
55.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September 12, 1924, *RIAC*, 893.00/5536A.
56. Telegram from Acting British Consul-General at Shanghai to British Consul, Nanking, September 5, 1924, *RIAC*, 893.00/5592.
57.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9, 1924, *RIAC*, 893.00/5484;
58.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30, 1924, *RIAC*,

- 593.00/5487.
59.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30, 1924, *RIAC*, 893.00/5485.
 60.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9, 1924, *RIAC*, 893.00/5603.
 61.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8, 1924, *RIAC*, 893.00/5499.
 62.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1, 1924, *RIAC*, 893.00/5509.
 63.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6, 1924, *RIAC*, 893.00/5495.
 64.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2, 1924, *RIAC*, 893.00/5518.
 65.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7, 1924, *RIAC*, 893.00/5532.
 66.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3, 1924, *RIAC*, 893.00/5520.
 67.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7, 1924, *RIAC*, 893.00/5498.
 68.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8, 1924, *RIAC*, 893.00/5502.
 69. The Charge in China (Be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7, 1924, *RIAC*, 893.00/5535.
 70.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 1925, *RIAC*, 893.00/6009.
 71.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5, 1925, *RIAC*, 893.00/5947.
 72.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8, 1925, *RIAC*, 893.00/5952.
 73.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24, 1925, *RIAC*, 893.00/5963.
 74.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7, 1925, *RIAC*, 893.00/6680.
 7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China (Ruddock), June 29, 1921, *RIAC*, 893.102 Ic/3.

7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 February 7, 1925, *RIAC*, 893.00/6009.
77.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 March 30, 1925, *RIAC*, 893.00/6063.
78. Verbal Message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3, 1924, *RIAC*, 893.00/5584。
以上美國中國國內事務檔案(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簡寫：RIAC)
79. Mr. Wu to Mr. Hay, January 20, 1902 & Mr. Hay to Mr. Hay, January 30, 1902, *FRUS*, 1921, p.184.
以上美國對外關係文件(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簡寫：FRUS)
80. Foreign Owned Press in Shanghai: Current Events Report, November 16, 1921, *MID*, 2657-I-220.
以上美國軍事情報處檔案(*Correspondence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 Relating to Gener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Conditions in China, 1918-1941*.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987.) (簡寫：MID)
81. Situation in China, Minutes of Foreign Office, April 1924, *FO371/10243*.
82. Telegram from Sir R. Macleay (Peking), August 27, 1924, *FO371/10243*.
83. Hostilities in Kiangsu and Chekiang, August 28, 1924, *FO371/10243*.
84. Telegram from Sir R. Macleay (Peking), August 28, 1924, *FO371/10243*
85. Sir R. Macleay to the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 January 8, 1924, *FO371/10243*.
以上英國外交檔案(Foreign Office (Great Britain). *Central Correspondence, Political, China, 1905-1940*. London: Public Record Office.) (簡寫：FO371)
86. Trade Outlook, Memorandum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 October 7, 1924, *CAB/24/168*.
以上英國內閣檔案(The National Archives (Great Britain). *The Cabinet Paper, 1915-1978*.) (簡寫：CAB)
87. Oral Answers, October 8, 1924, *H.C. Deb.*, 5th series, Vol.177, pp.565-566.
以上英國國會辯論檔(His Stationery Majesty's Office (Great Britain). *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Commons*. London: His Stationery Majesty's

Office.) (簡寫：H.C. Deb.)

88. 〈北京芳澤公使ヨリ幣原外務大臣宛(1924年8月28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蘇浙江開戰風說ニ對シ外交團領事團警告ノ件》,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各國態度第四卷, 1-6-1/1-0981。
- Pekin Hōsawa kōshi yori Heihara gaimudaijin ate 1924.08.28,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o sekkō kaisen fūsetsu ni taishi gaikō dan ryōji dan keikoku no ken*,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akkoku taido dai 4 kan*, 1-6-1/1-0981.
89. 〈在倫敦林大使ヨリ幣原外務大臣(1924年9月6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各國新聞論調, 1-6-1/1-0978。
- Zai Rondon Hayashi taishi yori Heihara gaimudaijin 1924.09.06,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akkoku shinbun ronchō*, 1-6-1/1-0978.
90.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江浙戰況第一卷至第四卷, 1-6-1/1-0970; 各國態度第四卷, 1-6-1/1-0981。
-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ō setsu senkyō*, *da 1 kan- dai 4 kan*, 1-6-1/1-0970; *kakkoku taido dai 4 kan*, 1-6-1/1-0981.
91. 〈上海矢田總領事ヨリ幣原外務大臣宛(1924年8月23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蘇浙江開戰風說ニ對シ外交團領事團警告ノ件》,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各國態度第四卷, 1-6-1/1-0981。
- Shanghai Yada sōryōji yori Heihara gaimudaijin ate 1924.08.23,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o sekkō kaisen fūsetsu ni taishi gaikō dan ryōji dan keikoku no ken*,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akkoku taido dai 4 kan*, 1-6-1/1-0981.
92. 〈在上海武官ヨリ軍令部次長宛(1924年9月9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江浙戰況第二卷, 1-6-1/1-0970。
- Zai Shanghai bukan yori gunreibu jichō ate 1924.09.09,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ō setsu senkyō dai 2 kan*, 1-6-1/1-0970.
93. 〈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ヨリ海軍次官、軍令部次長宛(1924年9月9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江浙戰況第二卷, 1-6-1/1-0970。
- Daiichi ken gai kantai shireikan yori kaigun jikan, gunreibu jichō ate 1924.09.09,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ō setsu senkyō dai 2 kan*, 1-6-1/1-0970.
94. 〈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ヨリ海軍次官、軍令部次長宛(1924年10月13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江浙戰況第四卷, 1-6-1/1-0970。
- Daiichi ken gai kantai shireikan yori kaigun jikan, gunreibu jichō ate 1924.10.13,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ō setsu*

- senkyō dai 4 kan, 1-6-1/1-0970.
95. 〈在上海武官ヨリ軍令部次長宛(1924年10月13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江浙戰況第四卷, 1-6-1/1-0970。
- Zai Shanhai bukan yori gunreibu jichō ate 1924.10.13,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ō setsu senkyō dai 4 kan, 1-6-1/1-0970.
96. 〈岡村中佐ヨリ參謀總長宛(1924年10月13日、14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江浙戰況第四卷, 1-6-1/1-0970。
- Okamura chūsa yori sanbō sōchō ate 1924.10.13-14,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ō setsu senkyō dai 4 kan, 1-6-1/1-0970.
97. 〈江浙間に軍艦爭奪戰始まる〉, 《東方通信》, 第6號(1924.08.1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江浙戰況第一卷, 1-6-1/1-0969。
- “Kō setsu aidani gunkan sōdatsusen hajimaru,” *Tōhō tsūshin*, dai 6 gō (1924.08.13),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ō setsu senkyō dai 1 kan, 1-6-1/1-0969.
98. 〈瀏河寧浙軍盡出〉, 《東方通信》, 第15號(1924.09.09),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江浙戰況第一卷, 1-6-1/1-0970。
- “Ryū kawa Nei Setsu gun jin shutsu,” *Tōhō tsūshin*, dai 15 gō (1924.09.09),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ō setsu senkyō dai 1 kan, 1-6-1/1-0970.
99. 〈上海岡村中佐ヨリ參謀總長宛(1924年9月9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江浙戰況第二卷, 1-6-1/1-0970。
- Shanghai Okamura chūsa yori sanbō sōchō ate 1924.09.09,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ō setsu senkyō dai 2 kan, 1-6-1/1-0970.
100. 〈濟南菊池少佐ヨリ參謀次長宛(1924年9月10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江浙戰況第二卷, 1-6-1/1-0970。
- Sainan Kikuchi shōsa yori sanbō jichō ate 1924.09.10,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ō setsu senkyō dai 2 kan, 1-6-1/1-0970.
101. 〈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ヨリ海軍次官、軍令部次長宛(1924年10月13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江浙戰況第四卷, 1-6-1/1-0970。
- Daiichi ken gai kantai shireikan yori kaigun jikan, gunreibu jichō ate 1924.10.13,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ō setsu senkyō dai 2 kan, 1-6-1/1-0970.
102. 〈北京坂西中將ヨリ參謀次長宛(1924年9月10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江浙戰況第二卷, 1-6-1/1-0970。

- Pekin Sakanishi chūjō yori sanbō jichō ate 1924.09.10,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ō setsu senkyō dai 2 kan, 1-6-1/1-0970.
103. 〈北京坂西中將ヨリ參謀次長宛(1924年9月11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江浙戰況第二卷, 1-6-1/1-0970。
- Pekin Sakanishi chūjō yori sanbō jichō ate 1924.09.11,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ō setsu senkyō dai 2 kan, 1-6-1/1-0970.
104. 〈外交部節略(1924年9月11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蘇浙江開戰風說ニ對シ外交團領事團警告ノ件》,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各國態度第四卷, 1-6-1/1-0981。
- Gaikō bu setsuryaku 1924.09.11,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o sekkō kaisen fūsetsu ni taishi gaikō dan ryōji dan keikoku no ken*,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akkoku taido dai 4 kan, 1-6-1/1-0981.
105. A Letter from Chi Hsieh Yuan, Inspecting Commissioner of Kiangsu, Anhui and Kiangsi, to American Consul-General & Senior Consul, Shanghai (August 27, 1924), 收入在〈上海矢田總領事ヨリ幣原外務大臣宛(1924年9月5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蘇浙江開戰風說ニ對シ外交團領事團警告ノ件》,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各國態度第四卷, 1-6-1/1-0981。
- A Letter from Chi Hsieh Yuan, Inspecting Commissioner of Kiangsu, Anhui and Kiangsi, to American Consul-General & Senior Consul, Shanghai (August 27, 1924), in Shanhai Yada sōryōji yori Heihara gaimudaijin ate 1924.09.05,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o sekkō kaisen fūsetsu ni taishi gaikō dan ryōji dan keikoku no ken*,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akkoku taido dai 4 kan, 1-6-1/1-0981.
106. Defense Commissioner of Sunkiang and Shanghai to Senior Consul (August 27, 1924), 收入在〈上海矢田總領事ヨリ幣原外務大臣宛(1924年9月5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蘇浙江開戰風說ニ對シ外交團領事團警告ノ件》,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各國態度第四卷, 1-6-1/1-0981。
- Defense Commissioner of Sunkiang and Shanghai to Senior Consul (August 27, 1924), in Shanhai Yada sōryōji yori Heihara gaimudaijin ate 1924.09.05,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Kō so sekkō kaisen fūsetsu ni taishi gaikō dan ryōji dan keikoku no ken*,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akkoku taido dai 4 kan, 1-6-1/1-0981.
107. 〈北京坂西中將ヨリ參謀次長宛(1924年9月9日)〉,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江浙並奉直紛擾關係》, 江浙戰況第二卷, 1-6-1/1-0970。
- Pekin Sakanishi chūjō yori sanbō jichō ate 1924.09.09,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 zō, *Kō setsu nami hō choku fun jō kankei*, *Kō setsu senkyō dai 2 kan*, 1-6-1/1-0970
以上日本外務省記録
108. 〈江浙問題に関する件(1)〉,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 《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 卷130騒亂,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297100。
Kō setsu mondai ni kansuru ken (1), *Bōei shō bōei kenkyūsho zō*, *Taishō 13 nen kumon bikō*, kan 130 sōran, ajia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farensukōdo, C08051297100.
109. 〈江浙問題に関する件 (2)〉,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 《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 卷130騒亂,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297200。
Kō setsu mondai ni kansuru ken (2), *Bōei shō bōei kenkyūsho zō*, *Taishō 13 nen kumon bikō*, kan 130 sōran, ajia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farensukōdo, C08051297200.
110. 〈在支公使館附武官ヨリ軍令部次長宛(1924年8月28日)〉,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 《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 卷130騒亂,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297100。
Zai shi kōshikan fu bukan yori gunreibu jichō ate 1924.08.28, *Bōei shō bōei kenkyūsho zō*, *Taishō 13 nen kumon bikō*, kan 130 sōran, ajia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farensukōdo, C08051297100.
111. 〈在上海武官ヨリ軍令部次長宛(1924年8月28日)〉,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 《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 卷130騒亂,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297100。
Zai Shanhai bukan yori gunreibu jichō ate 1924.08.28, *Bōei shō bōei kenkyūsho zō*, *Taishō 13 nen kumon bikō*, kan 130 sōran, ajia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farensukōdo, C08051297100.
112. 〈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 其一(1924年8月29日)〉,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 《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 卷131騒亂止,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000。
Daiichi ken gai kantai hijōhō Kō setsu mondai sono 1 1924.08.29, *Bōei shō bōei kenkyūsho zō*, *Taishō 13 nen kumon bikō*, kan 131 sōran shi, ajia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farensukōdo, C08051300000.
113. 〈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 其四(1924年9月7日)〉,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 《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 卷131騒亂止,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000。
Daiichi ken gai kantai hijōhō Kō setsu mondai sono 4 1924.09.07, *Bōei shō bōei kenkyūsho zō*, *Taishō 13 nen kumon bikō*, kan 131 sōran shi, ajia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farensukōdo, C08051300000.

114. 〈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 其一至其十五(1924年8月29日至10月15日)〉,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 卷131騒亂止,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000、C08051300100、C08051300200。

Daiichi ken gai kantai hijōhō Kō setsu mondai sono 1-15 1924.08.29-10.15, Bōei shō bōei kenkyūsho zō, *Taishō 13 nen kumon bikō*, kan 131 sōran shi, ajia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farensukōdo, C08051300000, C08051300100, C08051300200.

115. 〈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ヨリ軍務局長宛(1924年9月1日), 江浙問題に関する件(1)〉,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 卷130騒亂,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297100。

Daiichi ken gai kantai shireikan yori gunmu kyokuchō ate 1924.09.01, Kō setsu mondai ni kansuru ken (1), Bōei shō bōei kenkyūsho zō, *Taishō 13 nen kumon bikō*, kan 130 sōran, ajia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farensukōdo, C08051297100.

116. 〈佐世保鎮守府参謀長ヨリ軍務局長宛(1924年9月2日), 江浙問題に関する件(2)〉,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 卷130騒亂,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297200。

Sasebo Chinjufu sanbou chō yori gunmu kyokuchō ate 1924.09.02, Kō setsu mondai ni kansuru ken (2), Bōei shō bōei kenkyūsho zō, *Taishō 13 nen kumon bikō*, kan 130 sōran, ajia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farensukōdo, C08051297200.

117. 〈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 其三(1924年9月4日)〉,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 卷131騒亂止,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000。

Daiichi ken gai kantai hijōhō Kō setsu mondai sono 3 1924.09.04, Bōei shō bōei kenkyūsho zō, *Taishō 13 nen kumon bikō*, kan 131 sōran shi, ajia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farensukōdo, C08051300000.

118. 〈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ヨリ軍務局長宛(1924年9月4日), 江浙問題に関する件(2)〉,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 卷130騒亂,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297200。

Daiichi ken gai kantai shireikan yori gunmu kyokuchō ate 1924.09.04, Kō setsu mondai ni kansuru ken (2), Bōei shō bōei kenkyūsho zō, *Taishō 13 nen kumon bikō*, kan 130 sōran, ajia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farensukōdo, C08051297200.

119. 〈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 其五(1924年9月10日)〉,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 卷131騒亂止,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000。

Daiichi ken gai kantai hijōhō Kō setsu mondai sono 5 1924.09.10, Bōei shō bōei kenkyūsho zō, *Taishō 13 nen kumon bikō*, kan 131 sōran shi, ajia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farensukōdo, C08051300000.

120. 〈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 其六(1924年9月13日)〉,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 卷131騷亂止,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00。

Daiichi ken gai kantai hijōhō Kō setsu mondai sono 6 1924.09.13, Bōei shō bōei kenkyūsho zō, *Taishō 13 nen kumon bikō*, kan 131 sōran shi, ajia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farensukōdo, C0805130000.

121. 〈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2)、(3) 其十、其十一、十二(1924年9月26日、9月30日、10月3日)〉,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 卷131騷亂止,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100、C08051300200。

Daiichi ken gai kantai hijōhō Kō setsu mondai (2), (3) sono 15, 11, 12, 1924.09.26, 1924.09.30, 1924.10.03, Bōei shō bōei kenkyūsho zō, *Taishō 13 nen kumon bikō*, kan 131 sōran shi, ajia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farensukōdo C08051300100, C08051300200.

122. 〈第一遣外艦隊秘情報江浙問題(3) 其十五(1924年10月15日)〉,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大正十三年公文備考》, 卷131騷亂止,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08051300200。

Daiichi ken gai kantai hijōhō Kō setsu mondai (3) sono 15 1924.10.25, Bōei shō bōei kenkyūsho zō, *Taishō 13 nen kumon bikō*, kan 131 sōran shi, ajia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farensukōdo, C08051300200.

以上日本防衛省檔案

123. 理財局國庫課編, 〈支那ノ動亂(江浙戦ヨリ延テ直隸反直兩派ノ争亂) 第一報(1924年9月25日)〉, 國立公文書館藏, 《昭和財政史資料》, 第3號第70冊,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A08072194800。

Ri zai kyoku kokko ka, hen. Shina no dōran (Kō setsu sen yori en te chokurei han choku ryōha no sōran) dai 1 pō 1924.09.25, Kokuritsu kōbunsho kan zō, *Shōwa zaisei shi shiryō*, dai 3 gō dai 70 satsu, ajia rekishi shiryō sentā, refarensukōdo, A08072194800.

以上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124. 〈上海總商會電：淞滬特別區事(1925年2月7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 03-17/011-01-021。

Shanghai zong shang hui dian: song hu te bie qu shi 1925.02.07, Zhong yang yan

-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7/011-01-021.
125. 〈外交部電上海、煙台交涉員(外艦開赴上海事)(1924年8月29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 03-11/019-03-001。
- Wai jiao bu dian Shanghai, Yantai jiao she yuan (wai jian kai fu Shanghai shi) 1924.08.29,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19-03-001.
126. 〈外交部電金陵交涉員(外艦有無開到下關由)(1924年8月29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 03-11/019-03-002。
- Wai jiao bu dian Jinling jiao she yuan (wai jian you wu kai dao xia guan you) 1924.08.29,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19-03-002.
127. 〈告外交團勸解盧逆武裝以保公安之理由(1924年9月2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 03-11/019-01-023。
- Gao wai jiao tuan quan jie lu ni wu zhuang yi bao gong an zhi li you 1924.09.23,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19-01-023.
128. 〈部長會晤英麻使問答(1925年2月4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 03-11/019-04-005。
- Bu zhang hui wu ying ma shi wen da 1925.02.04,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19-04-005.
129. 〈黃秘書宗法往英館會晤英麻使談話記錄(1924年9月2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 03-11/019-01-023。
- Huang bi shu Zongfa wang wu ying ma shi tan hua ji lu 1924.09.23,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19-01-023.
130. 〈黃秘書宗法往晤美館撫參贊談話記錄(1924年9月16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 03-11/019-01-013。
- Huang bi shu Zongfa wang wu mei guan fu can zan tan hua ji lu 1924.09.16,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19-01-013.
131. 〈黃秘書宗法往晤英麻使問答(1924年9月6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 03-11/007-002-019。
- Huang bi shu Zongfa wang wu ying ma shi wen da 1924.09.16,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07-002-019.

132. 〈黃秘書宗法往晤英麻使譚話紀要(1924年9月3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07-02-018。

Huang bi shu Zongfa wang wu ying ma shi tan hua ji yao 1924.09.03,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07-02-018.

133. 〈劉錫昌赴法館會晤嘉參贊問答(1924年9月3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09-04-009。

Liu Xichang fu fa guan hui wu jia can zan wen da 1924.09.03,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09-04-009.

134. 〈黃秘書宗法往晤英館台參贊談話記錄(1924年9月1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07-03-003。

Huang bi shu Zongfa wang wu ying guan tai can zan tan hua ji lu 1924.09.16,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07-03-003.

135. 〈熊垓赴日本使館會晤太田參議問答(1924年9月3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06。

Xiong Gai fu ri ben shi guan hui wu tai tian can yi wen da 1924.09.03,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19-01-006.

136. 〈熊垓赴日本使館會晤太田參議問答(1924年9月1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16。

Xiong Gai fu ri ben shi guan hui wu tai tian can yi wen da 1924.09.16,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19-01-016.

137. 〈劉錫昌赴法館會晤嘉參贊問答(1924年9月1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09-04-009。

Liu Xichang fu fa guan hui wu jia can zan wen da 1924.09.16,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09-04-009.

138. 〈總長會晤英麻使問答(外國干涉事)(1924年9月2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26。

Zong zhang hui wu ying ma shi wen da (wai guo gan she shi) 1924.09.24,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19-01-026.

139. 〈總長會晤英麻使問答(英國態度事)(1924年9月2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24。

Zong zhang hui wu ying ma shi wen da (ying guo tai du shi) 1924.09.24,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19-01-024.

140. 〈總長會晤英麻使問答(盧何事)(1924年9月2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25。

Zong zhang hui wu ying ma shi wen da (lu he shi) 1924.09.24,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19-01-025.

141. 〈總長會晤英麻使問答(盧何事、外國干涉事)(1924年9月2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25。

Zong zhang hui wu ying ma shi wen da (lu he shi, wai guo gan she shi) 1924.09.24,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19-01-025.

142. 〈總長會晤英麻使問答(盧何事、外國干涉事)(1924年9月2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26。

Zong zhang hui wu ying ma shi wen da (lu he shi, wai guo gan she shi) 1924.09.24,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19-01-026.

143. 〈總長會晤義翟使問答(1924年9月2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9-01-028。

Zong zhang hui wu yi di shi wen da 1924.09.24,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19-01-028.

144. 〈顧總長會晤英麻使、日本芳澤公使、法祁代使、美貝代使問答(1924年8月30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07-02-017。

Gu zong zhang hui wu ying ma shi, ri ben fang ze gong shi, fa qi dai shi, mei bei dai shi wen da 1924.08.30,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07-02-017.

145. 〈顧總長會晤英麻使問答(1924年8月27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07-02-016。

Gu zong zhang hui wu ying ma shi wen da 1924.08.27,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07-02-016.

146. 〈顧總長會晤義翟使問答(1924年9月17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

京政府外交部檔案》，03-11/012-01-013。

Gu zong zhang hui wu yi di shi wen da 1924.09.17,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bu dang an*, 03-11/012-01-013.

以上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

(二) 報紙、雜誌¹⁸⁹

1. “A Cooperative or Isolation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 August 1925.
2. “Chamber Asks Neutral Zone near Shanghai,” *The China Press*, 4 September 1924.
3. “Chekiang Troops and Position,”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 September 1924.
4. “Defense of Woosung is Strengthened in View of Naval Assault,” *The China Press*, 30 August 1924.
5. “Foreign Protection for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3 September 1924.
6. “General Chi Hsieh-Yuan Preparing for Big Offensive against Chekiang Line,” *The Shanghai Times*, 11 September 1924.
7. “Hostilities Believed to Be Unlikely for Another Week,”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8 August 1924.
8. “Just What is America Going to Do about It,” *The China Press*, 23 September 1924.
9. “Martial Law in Chapei; Strict Rulings Enforced,” *The China Press*, 29 August 1924.
10. “Nanking Troops on the March,”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9 August 1924.
11. “Naval and Military Heads Here Meet to Adopt Defense Plan,” *The China Press*, 23 August 1924.
12. “Powers Combine in Warning to Taking,” *The China Press*, 29 August 1924.
13. “Rival War Lords in China,” *The Times*, 11 September 1924.
14. “Shanghai Navy Patrols Chekiang Bay,” “Shanghai Navy Patrols High Sea,” *The China Press*, 31 August 1924.
15. “Sharp Fighting in China,” *The Times*, 6 September 1924.
16. “Soviet Intrigue in China; Attempt to Involve Japan,” *The Times*, 6 October 1924.
17. “State of Emergency is Declared in Settlement; Defense Force on Guard,” *The*

¹⁸⁹ 《大陸報》(*The China Press*)、《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字林西報》(*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上海日報》(*The Shanghai Times*)、《密勒氏評論報》(*The China Weekly Review*)、《泰晤士報》(*The Times*)、《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

- China Press*, 10 September 1924.
18. “The Neutrality of Shanghai,”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7 September 1924.
 19. “The Chaos in China,” *The Times*, 6 September 1923.
 20. “The Outlook in China,” *Manchester Guardian*, 4 April 1924.
 21. “The Independent Fleet,” *The Times*, 23 September 1924.
 22. “The Future Safety of Shanghai,” *The China Press*, 11 September 1924.
 23. 〈不安漲る上海財界：商取引は休止状態、船舶の航行注意〉，《時事新報》（上海），1924年9月2日。
“Fuan minagiru Shanhai zaikai: shōtorihiki ha kyūshi jōtai, senpaku no kōkō chūi,” *Jiji shinbō*, 2 September 1924.
 24. 〈支那經濟界の動搖：事態緊迫遂に大事出來か〉，《大阪毎日新聞》（大阪），1924年8月30日。
“Shina keizaikai no dōyō: jitai kinpaku tsuini daiji deki ka,” *Ōsaka mainichi shinbun*, 30 October 1924.
 25. 〈蘇浙開戦と海運〉，《大阪毎日新聞》（大阪），1924年9月5日。
“So setsu kaisen to kaiun,” *Ōsaka mainichi shinbun*, 5 September 1924.
 26. 〈東南戦局中兩方兵力之調査〉，《東方雜誌》，第21卷第17期，頁146-147。
“Dong nan zhan ju zhong liang fang bing li zhi diao cha,” *Dong fang za zhi*, di 21 juan di 17 qi, 146-147.
 27. 〈吳淞附近禁止外艦通行〉，《晨報》（上海），1924年9月6日，3版。
“Wu song fu jin jin zhi wai jian tong xing,” *Chen bao*, 6 September 1924, 3 ban.
 28. 〈江浙海軍比較〉，《晨報》（上海），1924年9月1日，2版。
“Jiang zhe hai jun bi jiao,” *Chen bao*, 1 September 1924, 2 ban.
 29. 〈江浙風雲與渤海艦隊〉，《晨報》（上海），1924年9月3日，3版。
“Jiang zhe feng yun yu bo hai jian dui,” *Chen bao*, 3 September 1924, 3 ban.
 30. 〈渤海艦隊之實力〉，《晨報》（上海），1924年9月4日，3版。
“Bo hai jian dui zhi shi li,” *Chen bao*, 4 September 1924, 3ban.
 31. 〈海戰亦不可免耶：吳淞形勢愈緊張〉，《晨報》（上海），1924年9月6日，2版。
“Hai zhan yi bu ke mian ye” wu song xing shi yu jin zhang,” *Chen bao*, 6 September 1924, 2 ban.
 32. 〈各國大調軍艦〉，《晨報》（上海），1924年9月3日，2版。
“Ge guo da diao jun jian,” *Chen bao*, 3 September 1924, 2 ban.
 33. 〈閩蘇艦隊之行動：海軍或不發生戰事〉，《晨報》（上海），1924年9月4日，2版。
“Min su jian dui zhi xing dong: hai jun huo bu fa sheng zhan shi,” *Chen bao*, 4 September 1924, 2 ban.

34. 〈何豐林口中之江浙軍形勢觀：前線浙軍數目較少、海軍一時可無衝突〉，《晨報》(上海)，1924年9月4日，2版。
“He feng lin kou zhong zhi jiang zhe jun xing shi guan: qian xian zhe jun shu mu jiao shao, hai jun yi shi ke wu chong tu, *Chen bao*, 4 September 1924, 2 ban.
35. 〈四國公使聯袂訪外長：對保護外僑事提出三項要求〉，《晨報》(上海)，1924年9月1日，2版。
“Si guo gong shi lian mei fang wai zhang: dui bao hu wai qiao shi ti chu san xiang yao qiu,” *Chen bao*, 1 September 1924, 2 ban.
36. 〈使團堅持滬淞劃為中立區域：政府擬據約駁復說〉，《晨報》(上海)，1924年9月6日，3版。
“Shi tuan jian chi hu song hua wei zhong li qu yu: zheng fu ni ju yue bo fu shuo,” *Chen bao*, 6 September 1924, 3 ban.
37. 〈東報鼓吹列強干涉我國：江浙問題引起之惡影響〉，《晨報》(上海)，1924年9月4日，3版。
“Dong bao gu chui lie qiang gan she wo guo: jiang zhe wen ti yin qi zhi e ying xiang,” *Chen bao*, 4 September 1924, 3 ban.

(三) 專書

1. Braisted, William. *Reynolds Diplomats in Blue: U.S. Naval Officers in China, 1922-1933*,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9.
2. Dennett, Tyler.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3.
3. U. S. Naval War College. *International Law Documents: Conference on the Limitation of Armament with Notes and Index, 1921*,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3.
4. Waldron, Arthur.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5. 古(蔣月)孫著，劉本軍標點，《甲子內亂始末紀實》，北京：中華書局，2007重印。
Gu, Tiaosun, zhu, Liu, Benjun, biao dian. *Jia zi nei luan shi mo ji shi*, Beijing: Zhonghua shu ju, 2007.
6.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日本外交史辭典編纂委員會編，《日本外交史辭典》，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kan, Nihon Gaikōshi Jiten Hensan Inkai, hen. *Nihon*

- gaikōshi jiten*, Tōkyō: Yamakawa Shuppansha, 1992.
7. 田子渝、劉德軍主編，《中國近代軍閥史辭典》，北京：檔案出版社，1989。
Tian, Ziyu, Liu Dejun, zhu bian. *Zhong guo jin dai jun fa shi ci dian*, Beijing: Dang an chu ban she, 1989.
 8. 石源華，《中華民國外交史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Shi, Yuanhua. *Zhonghua Minguo wai jiao shi ci dian*,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1996.
 9. 白井勝美著，陳鵬仁譯，《近代日本外交與中國》（《中國をめぐる近代日本の外交》），臺北：水牛出版社，1989。
Usui, Katsumi, zhu, Chen Pengren, yi. *Jin dai ri ben wai jiao yu zhong guo (Chūgoku o meguru kindai Nihon no gaikō)*, Taipei: Shui niu chu ban she, 1989.
 10. 白井勝美著，陳鵬仁譯，《中日關係史(1912-1926)》，臺北：水牛出版社，1990。
Usui, Katsumi, zhu, Chen Pengren, yi. *Zhong ri guan xi shi (1912-1926)*, Taipei: Shui niu chu ban she, 1990.
 11.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豐皇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
Mao, Haijian. *Ku ming tian zi xian feng huang di*,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shi ye gong si, 2008.
 1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Guo, Tingyi. *Jin dai zhong guo shi gang*, Xianggang: Xiang gang zhong wen da xue chu ban she, 1989.
 13. 黃月波等編，《中外條約彙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Huang, Yuepo, deng bian. *Zhong wai tiao yue hui bian*, Shanghai: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35.
 14. 應俊豪，《丘八爺與洋大人：國門內的北洋外交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9。
Ying, Chunhao. *Qiu ba ye yu yang da ren: guo men nei de bei yang wai jiao yan jiu*, Taipei: Guo li zheng zhi da xue li shi xue xi, 2009.
 15. 應俊豪，《外交與砲艦的迷思：1920年代前期長江上游航行安全問題與列強的因應之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0。
Ying, Chunhao. *Wai jiao yu pao jian de mi si: 1920 nian dai qian qi chang jiang shang you hang xing an quan wen ti yu lie qiang de yin ying zhi dao*, Taipei: Taiwan xue sheng shu ju, 2010.

(四) 論文

1. Iriye, Akira.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2. Chan, Lau Kit Ching(陳劉潔貞). "The Lincheng Incident: A Case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Between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and the First Nationalist Revolutio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10 (1972), 172-186.
3. Parks Coble, "War and Chinese Society," 「中國近代的再思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6月29日-7月1日。
Parks Coble, "War and Chinese Society," *Zhong guo jin dai de zai si kao: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huang suo wu shi zhou nian guo ji xue shu yan tao hui*,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2005.06.29-07.01.
4. 川島真，〈再論華盛頓會議體制〉，收入金光耀、王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Kawashima, Shin. "Zai lun hua sheng dun hui yi ti zhi," shou ru Jin Guangyao, Wang Jianlang, zhu bian, *Bei yang shi qi de zhong guo wai jiao*, Shanghai: Fu dan da xue chu ban she, 2006.
5. 呂芳上，〈北伐時期英國增兵上海與對華外交的演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7期(臺北，1997.6)，頁187-229。
Lu, Fangshang. "Bei fa shi qi ying guo zeng bing shang hai yu dui hua wai jiao de yan bian,"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ji kan*," di 27 qi (Taipei, 1997.06), 187-229.
6. 唐啟華，〈一九二〇年代中國外交的重估(1919-1931)〉，《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2002。
Tang, Qihua. "1920 nian dai zhong guo wai jiao de chong gu (1919-1931)," *1920 nian dai de zhong guo*, Taipei: Zhong hua min guo shi liao yan jiu zhong xin, 2002.
7. 唐啟華，〈北洋外交與「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收入金光耀、王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Tang, Qihua. "Bei yang wai jiao yu 'fan er sai— hua sheng dun ti xi'," shou ru Jin Guangyao, Wang Jianlang, zhu bian, *Bei yang shi qi de zhong guo wai jiao*, Shanghai: Fu dan da xue chu ban she, 2006.

Naval Demonstrations, Shanghai Neutralization and Cooperation Policy: An Analysis of the Powers' Responses to the Kiangsu-Chekiang War

Ying, Chun-hao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Oceanic Culture, NTOU

Due to the battle field of the Kiangsu-Chekiang War (K-C War) surrounding the Shanghai Settlement, the war caused the Powers great concern and anxiety. They used two methods to restrain gunfire: one method was to carry out naval demonstrations, and the other was to neutralize Shanghai. These were the usual ways that the Powers had used to deal with civil wars in China since the mid-19th century. By examining the Powers' strategies during the K-C War,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real situation of cooperation policies under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System in China.

Firstly, naval demonstrations, though seemingly strong, were actually a kind of moderate gunboat diplomacy. Instead of intervening in China's civil war by force, the demonstrations acted as a scare tactic, showing a united front of naval strength to intimidate the Chinese and protect foreigners. Secondly, the Shanghai neutralization plan, put forward by the Powers, was an exhibition of military strength, not a dispute of treaties or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Final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Japan was not as sincere as it seemed.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was a solid supporter of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System, Great Britain and Japan didn't always think in the same way. Their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smart strategy wielded to try to protect or even expand their established interests while not aggravating the United States.

Keywords: Kiangsu-Chekiang War, Gunboat Diplomacy, Shanghai Neutralization, Washington Conference System, Cooperation Policy.

